

高教信息参考

2017年第06期(总第116期)

湖南文理学院图书馆 主办

图书馆信息咨询部 主编

2017年09月30日

目 录

特别关注	“双一流”建设 为什么是“他们”成功入选	(1)
	创新创业教育实践的“中国样本”——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综述	(3)
	大数据推进教育深度变革	(6)
部委要闻	教育部党组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发出通知要求	(8)
	陈宝生:办好中国高等教育要回答好六个问题	(8)
	人社部要求加强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职业培训	(9)
	教育部召开2017年度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座谈会	(10)
	教育对口援藏工作暨“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工作会议召开	(10)
	高校高端智库联盟成立仪式暨首届圆桌会议在京召开	(11)
高教纵览	辽宁省高校将与百个县(区)建立需求对接	(12)
	我国将加强网络安全学科专业建设	(12)
	贵州赴国内8所知名高校引聘人才	(12)
	30所高校小程序27日集体上线	(13)
	新疆:督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编制	(14)
	河南高等院校全面启动“实体书店进校园”	(14)
	福建:高校新闻专业教师到媒体挂职	(14)
7所高校入选首批一流网络安全学院建设示范项目	(14)	
校长论坛	湖南文理学院副校长郭国强:搞好校内专业评估 助推高校内涵发展	(16)
	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人才培养质量是地方大学的生命线	(19)
理论探索	高等教育问责对本科教学评估的追问	(22)
	地方新建本科院校特色发展之路探索	(28)
他山之石	美国大学如何提升本科生的学习质量——基于“大学学习测评项目”的经验与启示(上)	(32)
	美国大学如何提升本科生的学习质量——基于“大学学习测评项目”的经验与启示(下)	(36)
高教人物 数说高教	南仁东	封里
	2005年——2015年全国与湖南省普通高校在校留学生人数	封底

高教人物



南仁东（1945—2017），男，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副台长，FAST 工程总工程师兼首席科学家。

1945 年出生的南仁东，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他经历“文革”动乱，1968 年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后，在东北的一个无线电厂一干就是十年。改革开放后，他代表中国天文台的专家曾在国外著名大学当过客座教授，做过访问学者，还参加过十国大射电望远镜计划。

南仁东，这位驰骋于国际天文界的科学家，曾得到美国、日本天文界的青睐，却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毅然舍弃高薪，回国就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副台长。当时他一年的工资，只等于国外一天的工资。1994 年始，他主持完成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的选址、立项、可行性研究及初步设计，主编科学目标，指导各项关键技术的研究及其模型试验。2016 年 9 月 25 日，举世瞩目的“中国天眼”在贵州竣工，它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它对宇宙的深入探测，有助于人类加深对宇宙起源和演化的了解。

2017 年 9 月 15 日晚，被誉为“中国天眼”之父的南仁东因病情恶化逝世，享年 72 岁。消息传来，社会各界都相继沉痛悼念并深切缅怀。新华社在《“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病逝》一文中这样评价他的伟大成就：“23 年时间里，他从壮年走到暮年，把一个朴素的想法变成了国之重器，成就了中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项目。缅怀南老，致敬科学精神！”。

您的关注和支持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您的意见和建议是我们改进的方向，**欢迎反馈意见和建议。**

图书馆信息咨询部联系方式：

QQ 在线： 980567269、8727238、498125855

联系电话： 0736-7186097-829

电子邮箱： hnwlts@163.com

馆内咨询： 西院图书馆四楼工具书阅览室

“双一流”建设 为什么是“他们”成功入选

今天，中国高等教育掀开了崭新一页。42所学校进入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行列、95所学校进入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行列，“双一流”建设将为中国高等教育由大向强迈进而共同奋斗。随着“双一流”建设名单的公布，这一牵动全国高校乃至全社会关注的大事，也将真正迈出实质性一步。

这份名单是如何遴选出来的？为什么是“他们”成功入选？“双一流”建设和以往的“985工程”“211工程”有何关联？做好“双一流”建设的关键是什么？为此，记者采访了教育部相关负责人、高校领导及多位专家。

■怎样遴选认定

竞争优选、专家评选、政府比选、动态筛选

结果公布后，社会最为关心的是，“双一流”建设高校是如何选出来的？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双一流”建设高校通过竞争优选、专家评选、政府比选、动态筛选产生。第一步，是组建“双一流”建设专家委员会，具体承担遴选认定和审核建设方案的有关工作。第二步，依托专家委员会，以学科为基础，确定遴选认定标准，产生拟建设高校名单及学科。第三步，确定拟建设高校的建设方案。第四步，三部委根据专家委员会意见，研究确定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报国务院批准。

众所周知，评价大学办学质量是一个世界难题，国内外从来没有一个评价及其标准能够获得大家的一致认可。那么，哪些因素成为此次遴选认定的重要指标？

该负责人说，首先，综合考虑有关第三方评价，论证确定采用的第三方评价结果。专家委员会确定采用的评价包括人才培养、学科水平、贡献奖励、政策导向4类国内第三方评价。同时，还选取了高

校认可度较高、客观性较强的国际第三方学科评价，体现各学科点的实力水平及国际影响力。

“其次，以中国特色学科评价为主，特别是反映人才培养和学科水平的评价，酌情参考国际评价，统筹考虑国家战略、行业区域急需、不可替代性等因素，论证形成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认定标准；最后，据此遴选产生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议名单，并在此基础上，综合评价论证提出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建议。”这位负责人说。

他强调，一流大学建设高校重在一流学科基础上的学校整体建设、重点建设，全面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和创新能力；一流学科建设高校重在优势学科建设，促进特色发展。

【点评·专家】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双一流”建设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和实现人力资源强国战略的必然选择和重要举措。拥有优秀学生、学术精英、高端成果、国际声誉和一流服务等，已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一流大学的评价标准。纵观国外一流大学，无一不将本科人才培养和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放在学校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顾海良：这次“双一流”建设高校遴选，凸显了以学科为基础的理念。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要着力于以一流学科为基础，规划学校整体建设、重点建设，全面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和创新能力；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要凸显优势学科建设促进特色发展。可以说，“双一流”建设遴选认定的421个学科点和部分高校自主确定的44个学科点，较为合理地分布于“双一流”建设高校，成为“双一流”建设的起步和发展的标志。

■为什么会是“他们”

考虑高等教育战略布局，考虑国家急需、特色鲜明、无可替代的学科

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95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为什么是“他们”入选“双一流”建设？

对此，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强调，遴选认定“双

一流”建设高校，既要破除封闭固化的做法，又要考虑高等教育战略布局，考虑国家急需、特色鲜明、无可替代的学科。

——鼓励和支持高水平建设。“双一流”建设的目标是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前列或行列，是突破性工程，重在扶优扶强、必须坚持、鼓励、支持高水平。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布局。把国家重大战略布局作为遴选“双一流”建设高校的重要因素，发挥“双一流”建设对区域、行业发展的支撑带动作用。

——扶持特殊需求。对于经过长期建设、具备鲜明特色且无可替代的学科或领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求，但在第三方评价中难以体现的高校予以扶持。

“总的来说，就是既要继承原‘985工程’建设基础，又要加大对那些需要加强建设高校的压力，实行存量改革、激发活力。同时，还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重点围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并有利于加快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他说。

为何在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中划分A、B类，同样是社会关切的问题之一。对此，该负责人表示，这是为了打破身份固化、激发建设活力，希望督促所有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加快改革、加快发展，并推动归入B类的高校正视差距、奋起直追。

他表示，在此后具体工作中，将做到“同等重视、同等建设、同等评价”——即一流大学建设高校，都是冲击世界一流的重点建设对象；建设方案同等要求，政策经费等都同等覆盖；考核也“一把尺子一个标准”。

需要注意的是，此次遴选认定所产生的是“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重点在“建设”，是迈向世界一流的起点，而不是认定这些学校和学科就是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能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还要看最终的建设成效。”

【点评·校长】

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王省良：对我们来说，入选“双一流”建设名单是个意外惊喜。中医药是小学科，过去不太受重视，如果按照以往的评价体系，广州中医药大学或许没法入选。但细细思索，又在意料之中。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有六所中医药大学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双一流”建设指导思想，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医药事业和中医药高等教育的高度重视。

郑州大学校长刘炯天：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呼唤“一流大学”。可以说，地方大学与区域发展有着天然联系，立足区域发展，回应和服务国家与区域重大发展战略需求，是地方大学的特色和优势，更是建设一流大学的强大动力。

云南大学党委书记杨林：我们将围绕云南省民族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和地处边疆并毗邻南亚、东南亚的“三大优势”，将资源和区位优势转化为学校的学科优势，再把学科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着力建设民族学、高原山地生态与地球环境学科群、边疆治理与地缘政治学科群、生命与分子科学学科群、天文学五个一流学科。

■做好“双一流”建设的关键是什么

推进实施、全面落实

入选“双一流”建设，只是我国高等教育由大向强的起点。做好“双一流”建设的关键是什么？

该负责人说，三部委的工作重心将从遴选建设高校和建设学科转换到有效推进实施上来，建设高校将从凝练学科方向、编制建设方案转化到全面落实上来。“通过座谈会、宣讲会、培训班等多种形式，进一步统一思想、交流经验，采取典型引路的办法，带动帮助建设高校开好头、走对路，抓好建设落实。”

“同时，要研究制定绩效评价办法和相关政策举措，通过高校在内的各方面力量共同努力，深入论证提出新时期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标准，为建设中期评价指导和周期评价作准备。”他最后强调。

【点评·专家】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杜玉波：建设“双一流”，重在质量和特色。高校要坚持学科有选择性的发展，关键要建设好与本校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相匹配的学科专业群，压缩“平原”，多建“高峰”。学校要支持传统优势学科做大做强，也要大力促进学科的交叉融合，特别是建设好一批能够支撑国家急需、产业转型和区域发展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

■ “双一流”建设新在哪儿

动态监测、动态管理、不搞终身制

“双一流”建设会成为“985工程”“211工程”的翻版，会形成一入“985”终身“985”的局面吗？这是萦绕在众多高教人士心中的疑问。记者也注意到，除新增的新疆大学、云南大学、郑州大学三所高校外，其余39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都出自原“985工程”。

事实上，在今年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就曾表示，“双一流”建设不是“211工程”“985工程”的翻版，也不是升级版，它是一个全新的计划。

这位负责人也表示，这体现了继承创新的基本原则，充分考虑“211工程”“985工程”等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基础，继承好已有建设成效。同时，遴选认定并非一劳永逸。“双一流”建设以学科为基础，对建设过程实施动态监测，实行动态管理。根据期末评价结果等情况，重新确定下一轮建设范围，有进有出，打破身份固化，不搞终身制。

此外，针对目前高校出现的“挖人才创一流”的现实问题，教育部明确表示，认定遴选标准的依据、数据不与各类头衔的人才数量、各类基地平台条件等挂钩，坚决纠正高校数人头、拼硬件、铺摊子等恶性竞争、短期行为。

【点评·专家】

第二届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黄达人：“双一流”建设在遴选程序上继续采用无须高校事先申报、不折腾高校的做法。同时，从“双一流”建设高校的遴选结果来看，原“985”工程大学都进入“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名单，原“211”工程大学都进入“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这一结果肯定了以往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已取得的成效，也是开展“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基础。

作者：晋浩天 光明日报记者

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09月22日

创新创业教育实践的中国样本——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综述

当人们骑着“ofo”小黄车穿行于城市大街小巷时，或许并不知道，它原本只是第二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一个参赛项目。如今，小黄车从校园走向社会，引领全球100多个城市开始绿色低碳出行的风潮，并迅速成长为引起国际关注的中国共享经济的代表性公司。

“ofo”小黄车的快速成长，成为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缩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修订人才培养标准、改革教学育人机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强化创业实践训练、构建创业帮扶体系，推进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融合，不断加强孵化平台、创业基金、行业导师库等支撑体系建设，为全面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强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发挥了重要人才支撑作用。

瞄准创新创业实践，启动课堂变革

“互联网+”传统产业、“互联网+”新业态、“互联网+”公共服务、“互联网+”技术支撑平台……这几年，由大学生创业团队开发的各类基于互联网的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新模式在不断推陈出新，让人眼花缭乱。与此同时，数据显示，2014年以来，我国平均每天大约有1万家企业诞生，

创业投资总量超过 3500 亿元。

在“国家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首时代主题曲的感召下，各高校根据市场动态，积极开展教学改革探索，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学校人才培养，切实增强学生的创业意识、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厚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土壤。

“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关键是要抓好实践育人这一环节。”湖北省教育厅厅长陶宏说，创新创业教育不仅仅是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要把实践育人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重要举措，把教育精准扶贫作为实践育人重要阵地，把社会优质资源作为实践育人重要力量，把实习实训基地作为实践育人重要载体。

2015 年，温州大学启动“3+1”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针对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和基础知识学习脱节问题，把分散在各院系、有创业意愿且已完成本科 3 年学习的学生，集中选拔到创业学院进行一年的针对性培养。

为了培养学生创业意识，不少高校纷纷开设了“创业基础”“创业导引”等实战课程、特色课程和网络课程，初步形成了“课堂+实训”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比如，清华大学重点建设了“跨学科系统集成设计挑战”等系列挑战性示范课；北京大学形成了“北大十五堂创业课”等一批初创企业实战课程。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高校立足本校专业实际，不断探索建立最能接近市场实际的课程体系。比如，华北电力大学建立了第一课堂第二课堂相互融合、线上线下相互配合的创业指导课程体系，形成了集创业基础理论教师、专业教师、社会导师于一体的创业导师团。学校成立创业服务中心，设了 6 个专业的创业孵化室，为学生提供公司注册、企业管理、创业孵化、融资对接等“一站式”创业指导与服务。

课程的变化，促使教师也要作出改变。为调动广大教师参与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积极性，教育部

专门印发了《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高校也通过修订教学管理与教师考评文件，鼓励教师改变教学与考核方式，加强专职教师技能培训，引进行业师资力量，支持教师离岗参与成果转化或创业。

据 2016 年底统计数据显示，各地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专职教师数共计 2.6 万余名，兼职导师数共计 7.6 万余名。在各省级教育部门各高校推荐的基础上，教育部初步建成“全国万名优秀创新创业导师人才库”，已有近 5000 名专家入库。

搭建产学研融合平台，夯实实践育人基础

“ofo”小黄车的事例告诉人们：青年学生一个灵光乍现的“金点子”，若想变为现实，一个好的孵化平台至关重要。

这是当前高校推进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一个重要基础。浙江省教育厅厅长郭华巍说：“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创新创业土壤的厚植，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为了帮助大学生创业实现从“0”到“1”的转变，教育部积极引导高校建设校内外创业孵化平台。两年来，教育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分两批建设了 19 个高校国家创新创业示范基地。

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引导下，高校为大学生搭建了大量校内外预孵化和孵化平台。清华大学建设的 1.65 万平方米“清华 iCenter”，每年可支持 3000 名学生开展创新创业活动；集创业教育、团队培育、资源聚集和学科交叉的“三位一体”生态平台“x-lab”，则为师生和校友持续提供创新创业方面的教育及培训服务。

设立创业基金也是不少高校聚集资源支持大学生创业的重要方式。四川大学建立了“50 亿+”系列“双创”基金，并与中国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共同组建 120 亿元学生创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等，支持师生创新创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国家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供给侧改革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

一系列宏观政策推动下，各地区因地制宜整合各方面社会资源，主动搭建产学研融合平台，扶持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针对实践教学存在的短板，湖北省大力实施“荆楚卓越人才”协同育人计划，推动高校与行业企业、科研院所、实务部门建立战略联盟，引导合作双方共同制定人才培养目标和质量评价标准、设计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组织教学团队、建设实践平台，覆盖 50 多所高校的 150 多个专业点，参与部门和企业百余，建有省级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45 个、省级重点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5 个、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20 个，有效改善了高校实践教学条件。

为了推进协同育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浙江省鼓励学校建立行业特色二级学院等混合所有制学院，积极支持学校和行业企业、科研院所等用人单位共同培养人才，一方面通过邀请创业者、实业家和企业高级管理人才加入到高校创新创业教育队伍中，积极开展实务精英进课堂活动；另一方面通过建设省、校两级平台，开展创业导师培训，培育一支数量充足、质量较高的创业导师队伍，并通过多渠道整合科研训练、学科竞赛、校外实践等资源，探索建立“创新项目+创新团队+创新基地”模式。

在地方平台和大学科技园的保驾护航下，师生们的创新创业热情得到空前释放。仅山东大学科技园，入驻企业累计已近百家，一大批科技成果在科技园内实现转化，先后孵化出了山大鲁能、山大华特、山大奥太等高科技企业。武汉大学则抓住武汉打造“1+8 城市圈”的区域经济融合发展契机，积极构建“1+8 城市圈”技术转移中心，结合湖北省的中部地区产业特征和未来产业发展趋势，为城市圈规划提供产业发展方向建议及技术研发需求。

创新创业成为当今大学生青春梦、中国梦的一部分

今天，中国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溢出效应”正

在日益显现。中国的创新创业教育也吸引了世界高教界的目光，中国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样本正在被世界所认知，国际创新创业教育合作在不断深化。

——清华大学携手美国华盛顿大学合作创立的全球创新学院 GIX，着眼于解决具有全球性、挑战性的技术难题。

——北京大学与斯坦福大学等高校、马来西亚国家知识产权局等机构合作打造开放式的国际技术转移平台。

——浙江大学将联合基地建在帝国理工学院的校园内，开展联合研究、学生培养和跨国技术转移及企业孵化。

所有这些努力，都让我们年轻的创业者更具国际视角和家国情怀，站上一个更广阔的平台极目远眺。

正如浙江大学 2014 级毕业生、国内首批消费级脑电波产品研发公司“回车科技”创始人易昊翔所说：“刚创业时就凭大学生的激情，一个星期每天只睡 5 个小时，只想把技术变成产品。可是随着视野和格局变大，就希望自己的产品能够让社会变得更美好，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这就是创新创业教育为我们青年人带来的改变，也是创新创业教育带给我们的时代回响。”

易昊翔说出了广大青年的心声。今天，“青年学生+创新创业”的新生代能量被极大地激发出来。以连续 3 年举办的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为例，每一届的报名项目均为前一届的 3 倍以上，参与人数也在前一届的两倍以上。今年，第三届大赛参与高校达 2241 所，团队报名项目 37 万个，参与学生超过 150 万人。

如今，创新创业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青年大学生青春梦、中国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把激昂的青春梦融入伟大的中国梦，成为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留给这个时代珍贵的历史存照。

2017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第三届中国“互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大学生的回信中，勉励祖国的青年一代扎根中国大地了解国情民情，在创新创业中增长智慧才干，在艰苦奋斗中锤炼意志品质，在亿万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进行的伟大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用青春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彩篇章。

这，不仅饱含了总书记对青年一代的关怀，更饱含了总书记对青年一代不枉青春、不负使命的殷切期盼！

作者：柯进 中国教育报记者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7年09月16日

大数据推进教育深度变革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教育置身在一片大数据的新天地。在这片“田野”里精细描画学生、教师、学校的变化，追索学习的新形态、智慧生成的新规律，是当代教育研究刻不容缓的时代任务。

——编者

大数据是信息技术最新发展成果的典型代表，是工业4.0等各行业新一轮重大变革浪潮的主要推手，也对教育行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基于大数据的个性化教学、科学化评价、精细化管理、智能化决策、精准化科研等，将对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创新人才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驱动教学模式重塑

传统的教学模式映射了工业化时代的标准化、规模化的生产方式特征，以“教师、教材、课堂”为中心的“三中心”教学模式，注重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和教师的主导地位，强调课堂上知识的单向传授，成功解决了工业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大规模知识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地问题，但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

随着大数据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我们可以更精细地刻画师生教与学的特点，并针对性推送教学内容与服务，从而促使教学能够更有效f关注个体，

真正实现因材施教，培养出符合信息化时代所需要的个性化、创新型人才。比如，美国奥斯汀佩伊州立大学针对多元化的学生结构，采用“学位罗盘”个性化课程推荐系统，利用学习分析技术分析匹配对象的过往成绩与课程表之间的相关性，预测该生未来在该课程取得的成绩，从而帮助每个学生选择最适合自身发展的课程，最终达到提升学业表现的目的。

驱动评价体系重构

教育评价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有力手段。传统教育评价重视学生考试成绩，重在甄别证明，忽视了学生综合素质和个性发展，忽视学生进步和努力程度，忽视了诊断和改进。

大数据使评价内容更加丰富多元，不再仅仅注重学生的学习成绩，而更加关注身心健康、学业进步、个性技能、成长体验等方面。评价内容从单纯对知识掌握状况的评价，转向知识、能力和素养并重的综合性评价；评价方式从传统的一次性、总结性评价，转向过程性、伴随性评价；评价手段从试卷、问卷，转向大数据采集分析系统。随着多种基于云的学习平台、学习终端的广泛应用，收集学生的过程性学习数据如学习行为、学习表现、学习习惯等成为可能。通过分析挖掘学生学习的全过程数据，可为学生的自我发展、教师的教学反思、学校的质量提升等提供基于数据的实证分析支持。美国田纳西州的增值评价系统，通过对学生的成绩如语言、数学、科学等进行多年追踪分析，利用增值评价方法分析每个学生在学业上的进步，并以此为依据来评估学区、学校、教师效能。

驱动研究范式转型

教育科学的研究旨在为教育教学实践提供服务，其成果可直接作为改进教育实践的依据。

在传统的教育科学研究中，质性研究居多，量化研究较少；理论演绎居多，实证研究较少。虽采用了观察法、调查法、统计法等实证研究方法，但由于技术和手段的局限，往往只能采用抽样思维进

行局部样本的研究，且研究反馈具有滞后性，难以满足实际教育教学实践的需求。

大数据时代，教育数据的分析将走向深层次挖掘，既注重相关关系的识别，又强调因果关系的确定，通过数据分析技术发现教育系统中实际存在的问题，比传统研究范式更准确评价当前现状，预测未来趋势。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学者对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平台的教学视频操作行为进行分析，从中探寻学习者学习过程中的若干共性，并对这些共性与视频课程的呈现内容与方式进行相关分析，据此作为后续改善教学内容设计及呈现方式的重要依据。

驱动教育决策创新

学习分析与数据挖掘技术的进步促使教育决策更加精确与科学，决策方式从“基于有限个案”向“基于全面数据”转变，从而推动教育决策从经验型、粗放型向精细化、智能化转变。

对教育大数据的全面收集、准确分析、合理利用，已成为教育决策创新的重要驱动力。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通过应用大数据技术，创建了学生学习分析系统。借助这一系统，政府能够对各类学校的学生学习行为、学业成就、生源规划、家庭背景等海量信息进行深度挖掘，以此作为美国联邦政府及各州衡量教育发展、分配教育资源、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依据。

驱动教育管理变革

当前，在学校和教育机构中，教育管理者由于无法及时掌握教学与管理综合情况，难以对教育系统进行动态监管。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教育大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将数据分析的结果融入学校的日常管理与服务之中，是为师生提供精细化与智能化服务的基础。

以校园网络安全监管服务为例，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校园网站、应用程序、服务器及移动设备等产生的日常数据，并通过对海量日志文件的数据进行深度挖掘来检测与定位用户

如非法入侵、滥用资源等异常行为，帮助教育管理人员全面掌握潜在问题与威胁，大幅提升校园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我国须跟进教育大数据发展

大数据以其独特的功能及优势应用于教育领域，开启了教育科学发展的新时代，推动了教育领域的众多变革。数据驱动教育创新、数据驱动教育变革已成为不可更改的趋势。

目前，我国教育大数据的发展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随着应用的不断深入，应重点关注以下问题：

一是跨领域数据的融通共享。大数据的采集来源丰富多元，包括多个领域、多种类型的数据库。若只单纯关注教育领域的数据则远远不够，还需要综合考虑与分析教育对象相关领域的的数据。因此，如何实现跨领域的的数据信息无缝流转与融通共享，是教育大数据应用中首要解决的问题。

二是教师的数据素养。拥有数据并不一定能有效应用数据来改善教学实践。因此，要推进数据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的有效应用，亟待提高教师理解并应用数据改进教育教学实践的能力。美国早在2014年就明确对教师的数据应用能力提出要求，即教育工作者如何获取、分析和使用数据来支持教与学。

三是教育大数据的隐私与伦理问题。在教育大数据的分析与利用过程中，涉及众多的参与主体如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及相关大数据企业等，若对数据的归属权缺乏明确规范，则会导致以提供个性化服务为目的的海量数据采集分析过程中有大规模披露数据隐私的潜在危险，而这些记录数据一旦被泄露，则会对个人隐私造成极大侵害。目前，我国关于教育大数据的安全与隐私问题研究较少，应加快制定有利于促进教育大数据的准确、规范、统一使用和管理的相关法律及标准。

作者：吴砥，余丽芹 华中师范大学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7年09月21日

教育部党组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发出通知要求

近日，教育部党组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南开大学新入伍大学生重要回信精神发出通知。

《通知》指出，回信从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战略高度，进一步深刻回答了“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和“如何认识青年学生、如何教育引导青年学生、如何发挥青年学生作用”的重大问题，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青年成长成才的亲切关怀，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学生成长成才重要思想和改革强军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知》要求，各地各高校要把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作为教育系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与迎接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紧密结合，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紧密结合，与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紧密结合，与全面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紧密结合，自觉统一思想和行动，切实推动相关工作迈上新台阶。

一是切实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各地各高校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与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结合起来，坚定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引导學生主动投身军营以实际行动实现人生理想，把热血挥洒在实现强军梦的伟大实践之中。

二是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各地各高校要坚持贯穿结合融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落细落小落实，体现到教书育人全过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加强国家意识、法治意识、社会责任意识教育，不断深化学生对爱国等核心价值的理解，大力弘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三是深入开展国防教育和红色主题教育。各地各高校要切实加强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通过组织开展红色主题教育，深化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改革开放史等学习，继承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深入开展国防教育，加强军事训练管理，提升学生国防意识、军事素养和综合素质，教育引导學生为国防事业作贡献。

四是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各地各高校要深入挖掘一批有影响、真实感人的优秀大学生士兵先进典型，为广大青年学生成长成才树立榜样。将优秀大学生士兵先进典型事迹更好地融入征兵宣传教育进高校活动，积极运用微博、微信等网络新媒体，推动征兵宣传教育更具时代气息，更加形象直观，不断提高感染力、影响力和说服力。

五是进一步做好大学生征兵工作。各地各高校要会同各级兵役机关切实将大学生征兵工作摆上重要位置，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全面落实好国家出台的的大学生士兵保留学籍、考研加分、学费补偿代偿、就业招录等优惠政策，针对学生普遍关注的就业创业、培训升学等领域，积极制定出台地方性优惠政策，不断释放政策红利，充分激发学生参军报国热情。

陈宝生：办好中国高等教育要回答好六个问题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种什么树，成什么林，结什么果……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站在两个百年目标的交汇点上，中国高等教育需要回答好六个问题。”9月23日，“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八十年”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论坛上发言时这样说。针对近日公布的“双一流”建设名单，陈宝生强调，“双一流”建设搭建的是戏台不是擂台，各高校要拿出自己的业绩，一起表演。

陈宝生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办好中国特色高等教育，需要探索回答六个问题：一是回答好“举

什么旗、走什么路”。要紧紧结合我们党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始终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办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二是回答好“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经过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正在走近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要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朝着高等教育强国目标迈进。三是回答好“培养什么样的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要坚持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四是回答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朝着什么方向前进”。要深刻把握中外教育发展历史规律，扎根中国、融通中外，立足时代、面向未来，走适合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五是回答好“搭什么台、唱什么戏、创什么业”。要围绕合理定位、办出特色，加强从顶层设计到微观操作的思考探索，切实增强核心竞争力，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六是回答好“种什么树、成什么林、结什么果”。要坚持不懈培育优良校风和学风，营造良好政治和学术生态，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在论坛上表示，中国人民大学80年走过的历程揭示了三大命题：一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办的具有红色基因的高校能不能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二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能不能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三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高校能不能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这三大命题更是有待在‘双一流’建设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入探索的命题，我们必须树立坚定的自信。”

论坛现场，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11所高校的领导，共同探讨了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道路与办学经验。

人社部要求加强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职业培训

记者28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获悉，人社部日前下发《关于持续开展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技能就业行动的通知》，要求各地加强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职业培训，提升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能力。

据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人社部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职业院校、公共实训基地和各类职业培训机构，对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开展就业技能培训、新型学徒制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创新创业培训和技能脱贫培训等，帮助其掌握就业创业的专项技能，提高岗位工作能力，培训后就业创业率力争达到90%以上。

这位负责人要求，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将有培训意愿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全部纳入职业培训服务范围；鼓励将与企业签订6个月以上劳动合同的技能岗位新招用高校毕业生纳入新型学徒制培训范围；全面落实创新创业扶持政策，加强高校毕业生创新创业培训和实训；重点了解掌握零就业家庭、城乡低保家庭、农村贫困户、残疾等就业困难的毕业生情况；建立完善职业培训对接机制，精准提供职业培训服务等。

这位负责人强调，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共同推动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技能就业行动的工作机制；指导培训机构加强与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和基层就业服务平台的联系对接，确定社会需求大、就业前景好、毕业生认可度高的培训专业，开发对高校毕业生需求比较集中的培训项目；落实职业培训补贴政策 and 职业技能鉴定补贴政策等。

这位负责人表示，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创业，涉及许多家庭的福祉，也关系到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总体平稳，但部分大专以上学历的毕业生仍然存在就业难问题。各级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将此次就业行动作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重要任务，进一步提升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能力。

教育部召开2017年度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座谈会

9月23日，教育部在西安召开2017年度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座谈会。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出席会议并讲话，总结宣传工作领导小组成员、50所年度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及部分省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华南农业大学、湖南商学院、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做了典型发言。

林蕙青指出，教育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要部署，采取一系列举措扎实推进创新创业工作，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不断完善，创新创业教师队伍不断壮大，协同育人不断强化，支撑引领作用不断提升，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深入，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2017年创新创业总结宣传工作推选出的新一批50所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将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育紧密结合，将课堂教学和实践训练、创新和创业紧密结合，工作扎实，经验特色具有很好的推广价值。

林蕙青强调，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旧动能转换、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高校创新创业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各省市和高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大学生的回信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把创新创业教育作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抓手、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突破口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途径，引导广大青年把激昂的青春梦融入伟大的中国梦，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能力，强化创新创业指导服务，努力推动创新创业工作向纵深发展，开创高等教育新局面。

据悉，2017年度全国高校创新创业总结宣传工

作自年初启动，经学校总结、申报推荐、专家初选、社会调查、实地调研等环节，推选出50所年度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此项工作旨在以典型引领推动全国高校不断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充分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实现毕业生更高质量就业创业。

教育对口援藏工作暨“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工作会议召开

为深入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边稳藏重要战略思想，贯彻落实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9月18日，教育对口支援西藏暨“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会议总结交流了教育援藏工作情况，并对下一阶段教育援藏工作作出部署。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齐扎拉出席会议，教育部副部长孙尧出席会议并讲话。

孙尧强调，全国教育系统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入持久地推进教育援藏工作。要紧紧围绕“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这一主题，努力培育学生“五个认同”“三个离不开”思想，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全面落实“十三五”教育援藏任务，明确主体责任，健全工作机制，完善管理制度，实施好“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工作，坚持选好配强援藏干部和教师，重点加强以数理化学科为主的内地优秀教师进藏支教。

孙尧希望，广大援藏干部和教师继承发扬“老西藏精神”，做好教育的“送经者”与“取经者”，与本地教育工作者携手谱写高原教育事业新篇章。

教育援藏工作开展30多年来，教育部和全国教育系统始终把对口支援西藏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认真对待、精心部署，支援力度持续加大，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全覆盖的对口援藏体系。目前，已有北京大学等27所国内重点高校团队对口支援西藏7所高校，东中

部 7 个职教集团、13 所民办本科学校对口支援西藏七地市 8 所职业学校，以组团形式集中对口支援西藏 20 所中小学校。西藏内地办学也从最初的京、津、沪等全国 16 个省份扩展到在全国 21 个省份、17 所初中、14 所高中（含 5 所完中）举办西藏班，56 所示范性高中招收西藏班插班生，48 所中职学校举办西藏中职班。

高校高端智库联盟成立仪式暨首届圆桌会议在京召开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要求，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9 月 20 日，高校高端智库联盟成立仪式暨首届圆桌会议在京召开。教育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刘大为出席会议并讲话。

中国大学智库论坛秘书长李卫红介绍了联盟情况。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宣读了《高校高端智库联盟公约》。设在高校的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进行智库签约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首批 31 家联盟成员单位代表共同签署了公约。与会高校智库代表围绕继续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积极建言献策，并就新形势下如何发挥高校智库作用、提升联盟整体实力、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进行了研讨交流。

刘大为指出，高校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主力军，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高校高端智库联盟的成立，是高等教育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高校特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部通过出台《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

计划》、推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转型升级、创办《高校智库专刊》、指导举办“中国大学智库论坛”等重大举措，在高校智库建设上谋篇布局，成效明显，为党和国家科学决策提供了高水平智力支持。

刘大为强调，高校智库要把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上来，把行动落实到中央重大战略决策部署上来，把使命集中到学习宣传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要坚定方向、提高站位，服务国家、前瞻布局，突出优势、找准坐标，固本培元、练好内功，开放运行、扩大影响，更好发挥标杆作用和示范效应，以服务治国理政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据悉，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社科界共计出版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约 11 万部、发表论文约 131 万篇、承担各类研究项目 134 万多项、提交各类咨政报告 4.3 万篇。为充分发挥高校智库在服务党和国家方面的引领作用，在教育部社科司指导下，31 家高校高端智库积极响应中央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战略部署，共同发起成立高校高端智库联盟，以党和政府“信得过、用得上”为标准，集聚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校高端智库，打造智库标杆，形成高校高端智库协同发展的示范集群。

教育部有关司局、直属单位，31 家联盟成员所在高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辽宁省高校将与百个县(区)建立需求对接

9月27日记者获悉,辽宁省教育厅正在商请各市政府共同组织推进高校对接地方科技需求活动,促进高校与地方供需双侧贴紧靠实、捆绑发展、互补共赢。

辽宁省高校与省内企业在产业人才、科技项目对接方面签约率较低,其主要原因就是缺少有效的组织协调。为此,省教育厅商请各市政府共同组织对接活动,由各市政府负责本地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提出需要高校服务对接的科技需求项目。服务需求可以是科技成果;三次产业人才科技需求;创建各类技术研发机构、各类培训机构;县域经济发展需求、贫困地区教育发展需求等。需求单位可登录“辽宁省校企联盟信息共享与服务平台(<http://ue.upln.cn/>)”专用窗口提交需求内容。

辽宁省教育厅组织高校承接经各市政府核定的科技需求项目,高校负责将认领的地方科技需求项目分解到二级学院,落实到项目具体负责人,由负责人组建对接工作团队。

这种合作将建立常态制度,省教育厅、各市政府将分别设立对接活动联络办公室,具体负责对接工作。要确保每所高校科技管理部门至少联系一个县(区)政府、每个县(区)政府至少联系一所高校科技管理部门,每个产业校企联盟按服务方向与各市重点产业建立对应联系,基本实现全覆盖。为鼓励高校教师参与服务的热情,高校教师承接地方科技需求项目签订的正式协议,经备案按照省教育厅立项科研项目管理。同时支持高校与地方联合共建实验室和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高校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各类研发平台,面向地方需求适度开放,只收取基本成本费。

我国将加强网络安全学科专业建设

2017年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18日在上海举行。中央网信办副主任杨小伟在会上表示,将通过加强网络安全学院、学科、专业建设,支持高校、

企业和社会开展网络安全教育培训等多种方式大力培养网络安全人才。

高峰论坛上,十余位来自国内外的知名企业高管和专家学者围绕“安全、高效的未来互联网”“网络空间安全理念”“新兴技术形势下的网络空间安全新挑战”等议题展开研讨和交流。

杨小伟在会上表示,网络信息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渗透、驱动作用日趋明显,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的网络安全风险和挑战也不断增大。网络攻击、网络窃密、网络欺诈、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等现象频发,网络安全已成为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群众福祉的重大战略问题。

“网络空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杨小伟说,加强网络安全人才培养,要加快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基地建设,形成网络安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的良好生态,为维护网络安全提供有力智力支撑、人才保证和产业动力。

互联网领域发展变化非常快,新技术新应用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杨小伟说,还要加强技术创新,密切跟踪技术发展演进,同步做好安全防护。在物联网安全、区块链安全、人工智能安全、5G安全等方面加大研究力度,提早谋划,预先布局,有效防范不断变化的安全风险。

据了解,19日至20日将举办“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提升网民网络素养 共建清朗网络空间”“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网络·劳动·安全——移动互联时代的挑战与责任”“大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技术标准”等6个高峰论坛主题分论坛。

贵州赴国内8所知名高校引聘人才

贵州省2017年度“百家单位进高校·广揽英才促发展”引才活动启动仪式近日在清华大学举行,各市州、贵安新区以及30余家大数据、大健康等重点产业、重点领域的用人单位共携8000多个岗位需求参加活动。这也标志着贵州省2017年赴国

内知名高校特聘人才工作拉开帷幕。

据了解,为深入贯彻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关于人才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紧扣全省战略布局及社会发展急需,大力引进一批大数据、大健康等重点产业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助力贵州省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经省委、省政府批准,从今年9月中旬起,贵州省将组织各市州、贵安新区以及省内大数据、大健康等重点产业、重点领域的上百家企事业单位,利用近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分批分组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8所国内知名高校所在地区开展人才引聘活动。

这次在清华大学举办的首场人才引聘活动,通过前期的线上广泛宣传、线下精准对接、三轮定向邀约,共吸引到场求职人才1165人次,较上年度同比增长111.4%,其中博士78人次,硕士895人次,本科192人次。经现场洽谈,初步达成引才意向的共447人次,同比增长163%,其中博士23人次,硕士363人次,本科61人次,实现了2017年度贵州省校招工作的开门红。

贵州省还将陆续赴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上海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集中开展系列专项引才活动。

30所高校小程序27日集体上线

9月27日,教育部新闻办、新闻中心携手腾讯微信,在清华大学举行“新平台 新联动——30所高校小程序集体上线仪式暨教育政务新媒体宣传研讨会”,宣布全国近30所高校将上线专属小程序,借助小程序能力为高校师生提供更轻便的校园服务。这是教育系统政务新媒体运用新平台、新技术服务广大师生的又一次生动实践。率先推出小程序,也让教育政务新媒体走在了“互联网+政务”服务领域的前沿。

在教师节前夕,教育部政务新媒体借助腾讯微信公众平台正式推出“微言教育”小程序,并成功

开展社交化活动“致敬!老师”,当天小程序访问量即突破40万人次,覆盖微信用户近2000万。目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部分高校也已初步“试水”,北京大学“就业小助手”、武汉大学“智慧岛”、四川大学“校园导览”等,为广大师生提供更优质、更便捷、更全面的信息服务。

微信小程序是一种全新的连接用户与服务的方式,它可以在微信内被便捷地获取和传播,具有获取容易、体验轻便、不需下载、用完即走的特点。教育系统小程序,是教育部门、相关高校联合腾讯微信公众平台,向社会公众、师生提供资讯与服务的全新方式,可以整合教学、校园服务、校务管理,实现高校运作智慧化升级。微信用户只需打开微信客户端的“发现-小程序”,在搜索框中搜索“微言教育”或上线高校,即可访问。

教育系统小程序的上线,是对原来以“微言教育”公众号为核心的教育政务新媒体联盟的一个全新补充,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高校新媒体应用功能和发展前景。微信团队表示:“我们希望通过小程序,让微信能力进一步深入校园,打造现代化的教育体验,通过微信能力服务更多校园场景。”

自2013年1月1日教育部官方微博上线以来,教育部新闻办积极打造政务新媒体“微言教育”,目前已先后开通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入驻搜狐、新浪、人民日报、今日头条、网易、一点资讯、腾讯企鹅号等7个新闻客户端平台。目前,“微言教育”拥有粉丝3000余万,成为教育部发布重大政策、回应社会关切、服务沟通民众的重要平台。

在教育部政务新媒体的带动下,教育系统政务新媒体蓬勃发展。目前以“微言教育”为核心,联合32家省级教育部门,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以及部分部属高校、地方高校、地市教育部门共1200家单位组成“中国教育政务新媒体联盟”,上下联通,左右贯通,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教育政务新媒体矩阵。

新疆：督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编制

记者9月21日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教育工作委员会了解到，新疆将组织力量督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编制情况，确保形成一支专职为主、专兼结合、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的高校思政工作队伍。

新疆要求，各高校落实专职思政工作人员和党务工作人员不低于全校师生人数1%的标准，每个院系配备1至2名专职组织员；按照师生比1:200的比例设置专兼职辅导员岗位，按照师生比不低于1:350比例设置专职思政课教师岗位。

据了解，新疆将探索建立把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政工作纳入各级党委抓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和单位绩效考核激励指标体系，作为单位评优选先和主要领导提级晋升的重要依据。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政工作，新疆将有计划、分批次开展高校书记、校长、领导班子成员、基层党组织书记、党务工作者、思政干部和教师、辅导员全员培训。

河南高等院校全面启动“实体书店进校园”

记者从河南省教育厅获悉，为进一步推进学校思想道德建设和书香校园建设，该省近日印发《河南省“实体书店进校园”三年行动计划》，今年在全省高等院校中全面启动“实体书店进校园”工作，重点推动在届省级以上文明单位中的67所高校校园实体书店建设；同时，在具备建设条件的2000人以上寄宿制中学（含中职学校）中启动实体书店建设。

据悉，河南计划到2018年底，基本完成高校校园实体书店的建设任务，重点推动半数以上的具备建设条件的2000人以上寄宿制中学（含中职学校）校园实体书店投入使用。到2019年底，完成具备建设条件的2000人以上的寄宿制中学（含中职学校）校园实体书店的建设；选取一定数量的2000人以上非寄宿制中学（含中职学校）的实体书店试点建设并投入使用；鼓励和支持在小学、幼儿园及学校周边开办实体书店并开展试点工作。到

2020年底，具备建设条件的2000人以上中学（含中职学校）基本完成校园书店建设任务；实体书店在具备建设条件的小学、幼儿园要重点覆盖。

据了解，校园实体书店的用房将由学校提供，原则上建设面积不宜过小，高校提供场地面积（含阅读区）应在200平方米以上，中学在150平方米以上，小学和幼儿园在60平方米以上。经营范围包括图书、杂志、报纸、音像制品、数字产品、文具文创产品等，其中图书类所占商品比例不得低于60%。服务范围应包括休闲阅读、数字阅读、数字教育、云书网O2O体验服务、个性定制服务、文化便利服务等，将校园书店建成集阅读学习、展示交流、文化沙龙、师生活动、专题培训、创意生活等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式校园文化场所。

福建：高校新闻专业教师到媒体挂职

福建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近日下发通知，明确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6所本科高校今年要各选拔推荐一名新闻传播院系骨干教师，到《福建日报》《厦门日报》等主流媒体挂职担任记者，挂职时间为一年。

福建要求，高校新闻传播院系骨干教师到所在地主流媒体脱产挂实职，要有明确任务分工，参与采编一线工作。同时，实行高校教师到新闻单位挂职和科研课题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模式，由省委宣传部进行课题立项。

据了解，福建组织高校骨干教师到新闻单位挂职交流，旨在加强高校新闻传播院系师资队伍的建设，逐步推动新闻教学与新闻实践的结合，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努力造就一大批政治立场坚定、业务能力精良、作风素质过硬的新闻传播后备人才，为推进福建新闻事业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7所高校入选首批一流网络安全学院建设示范项目

记者从9月16日在上海举行的2017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上获悉，7所高校被确定为首批

一流网络安全学院建设示范项目高校，将通过探索新思路、新体制、新机制等培养更多网络安全人才。

据悉，成为首批一流网络安全学院建设示范项目的7所高校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东南大学、武汉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为了推动网络安全人才培养，2015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会同教育部开展了网络安全人才培养基地试点示范，北京邮电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是进入试点示范的首批高校。”中央网信办网络安全协调局负责人介绍说，两年多来，试点示范高校在网络安全人才培养方面开展了有益的探索，做了大量的工作。

今年8月，中央网信办、教育部联合印发文件，决定在2017年—2027年期间实施一流网络安全学院建设示范项目，通过探索网络安全人才培养新思路、新体制、新机制等，从政策、投入等多方面采取措施，经过10年左右的努力，形成国内公认、国际上具有影响力和知名度的网络安全学院。

“网络安全学院不是培养网络安全人才的唯一形式，如计算机学院等其他学院都可以成为网络安全人才的摇篮。”中央网信办网络安全协调局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实施一流网络安全学院建设示范项目带动和促进更多的高校、企业和社会各方面关心及参与网络安全人才培养工作。

湖南文理学院副校长郭国强：搞好校内专业评估 助推高校内涵发展

为了摸清专业建设家底，促进专业内涵发展及学校全面向应用型大学转型，作为地方本科高校的湖南文理学院于2015年在省内率先开展了校内本科专业评估工作。评估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得到了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专家等的充分肯定。按照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2016年初发出的有关本科专业评估试点工作的文件精神，为更好地做好本科专业评估的准备工作，作者从立意、操作、研究及感想几个方面报告有关开展校内专业评估的心得体会。

一、为什么选择开展校内专业评估

1. 明确高等教育深化改革方向，把握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着力点

潘懋元教授等提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重要方向在于推动高校分层分类、合理定位。他们的“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应当由不同的教育机构来实施”的观点，成为促进高校分类发展的一个理论依据。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教发【2015】7号）既发出了引导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明确信号，也从顶层设计高度明确了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的重要意义。分类发展将促使部分高校转型发展，并把专业结构优化及专业内涵建设作为工作重点。

提升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既是高校工作的目标，也是政府与社会的期盼。专业连接了高校与社会，“招工难、就业难”既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也给高校施加了巨大的工作压力。出现“招工难、就业难”问题的直接原因是专业人才的供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不适应，深层次原因是我国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突出。人才供给与需求不匹配问题就是人才质量问题。教育主管部门曾经期望借助行政手段（热门专业审批等措施）调控专业结构及

专业人才结构来促进人才质量提升，但效果并不理想。国内部分省市正积极试点的“按专业（类）招生”，是一种以近市场化手段迫使高校主动优化专业结构、增强专业办学实力进而促进人才质量提升的有效举措。

增强专业竞争实力、培育专业特色成为高校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着力点。在教育部已部署开展本科教学审核评估的情况下，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还确定在近年开展本科专业评估试点工作，很明显，这不是简单的加压力而是突出紧迫性，要求并督促各高校以专业评估为抓手，强化专业建设，以促进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提升。

2. 以评促改、以评促建，强化专业内涵建设

合格评估、水平评估是高校本科教学评估工作中使用最多的评估方式，都是针对办学机构的，能够对办学机构的教学水平进行评测并给出整体性评估结论。但是，这类评估一方面会因难以避免功利性操作导致结论失真，另一方面因数据的统计特性使得结果无法反映不同专业在同一指标上的差异，指标观测值“被平均”的可能性大。根据这样的评估结论，很难发现专业建设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对评估整改的直接指导效果往往大打折扣。

开展校内专业评估，目的在于强化教学院（系）以专业实力及特色求发展的专业建设理念。校内专业评估所使用的指标体系，既能体现学校的专业建设思想，又对学校专业建设的实情具有良好的针对性。评估指标体系中融入专业认证理念，通过专业评估就能促进专业建设更规范，并显著提升专业建设水平。通过评估，能摸清每个专业建设的家底，查找专业建设中的不足，并通过实施相应的整改措施，激发专业建设的内动力。校内实施专业评估，还能最大可能回避多种因素对评估结论的准确性的影响，自然而然，评估结果能为专业调整与退出提供重要依据。

二、专业评估指标体系的确定

1. 专业评估指标设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1. 专业建设规划与人才培养方案	1.1 定位与规划 1.2 人才培养方案*
2. 师资队伍	2.1 数量与结构* 2.2 师资培训 2.3 教育教学水平
3. 教学条件与利用	3.1 实验室与实践基地建设* 3.2 专业图书资料及应用 3.3 专业日常教学经费及专项经费
4. 培养过程及管理	4.1 教学改革与课程建设* 4.2 实践教学* 4.3 基层教学管理 4.4 质量监控*
5. 培养效果	5.1 基本理论与技能 5.2 学习质量* 5.3 毕业论文(设计) 5.4 社会声誉与就业
6. 专业特色	

注：带*的为重点指标

2. 指标设计特点

(1) 兼容并蓄，理念为先。具体表现为：

一是人才质量观与时俱进。人才质量观是开放的质量观，因为人才培养的各环节都可以接纳社会有关资源（师资、设备等）助力人才培养，人才质量自然也要接受社会各方的评价。基于这样的思考，指标体系中的一级指标以内容更丰富的“培养过程”“培养效果”替代了其他类似指标体系中的“教学过程”“教学效果”。正因为关注人才培养效果，指标把社会人士、校友近5年对人才质量的反馈信息、把学生在校外学习的质量评价方式及成效等作为观测重点内容。

二是专业建设理念实际可观测。专业定位及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是否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是否对接产业和行业需求？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课程体系改造是否更有利于应用型人才培养？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质量保障措施是否具体可操作？是否具有持续改进与成长的机制？专业人才质量评价机制是否到位、有效？考查这些指标时，都要求提供充足的佐证材料。

三是检测课程体系优化是否到位。对专业课程

体系考查时，重点关注课程体系设计或重构是否贯彻“供给侧结构改革”思想？该取消的课程是否取消？实践教学体系是否清晰？能以实践课开的是否做到位了？各类课程比例关系是否更合理？等等。

四是集思广益。指标体系中兼容了水平评估、审核评估、专业认证的思想与观念，兼顾学校深度转型实际需求，考虑了不同类专业的差异，基于中等偏上的要求来统一设定指标评估等级与权重，既体现学校的引导也表明学校的要求。

(2) 植根实际，彰显个性。专业评估的评估指标对地方本科学院的专业建设实际（含细节）必须有很强的针对性。由于校内评估不同于外来评估，必须考虑学校的实际，指标的选择、指标的权重都必须综合多方因素考虑后确定，对指标等级要求偏高或偏低都不合适。偏低不利于专业建设水平提升，偏高就脱离了地方本科学校专业建设的实际。为准确反映专业建设实际，对有关共享性教学资源（师资、教学设备等）的指标都有特别的考虑。原则是支持资源共享，但不能因为资源共享影响教学质量，有关指标强调了专业对资源的真实需求和实际使用量。对指标体系中的指标，能定量考查的尽量采取定量比较，为减少工作量，有的指标以重点指标为依据对相关的一些指标进行定性评价。

(3) 点面结合，突出重点。在各重点指标中，对“人才培养方案”，主要考查专业每年两次的常态化调研情况、企业或行业对人才培养方案给出的修订建议、确定专业建设目标的依据，以及“工学交替、产教融合”的执行情况。对“师资队伍数量与结构”，强调了两个重要考查点，其一是每个专业对师资的基本要求是否满足，其二是强调“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的数量与质量，其占比不应低于30%。对“实验室与实践基地建设”，侧重于对实验实训条件的保障度以及执行情况的考查。对“教学改革与课程建设”，重点考查课程体系的适时优化与重构情况，考查理论课与实践课程比例关

系，考查课程教学的分阶段、多方式考核与最终验收情况，考查专业主干课程实施案例式、研究性、项目式等教学模式的比例是否达到50%以上。对“实践教学”，侧重对实践教学环节及实践课程体系构建情况、实践类课程设置、集中实践教学环节的比重、实践教学的内容重构和优化及时性、实验室开放等方面的考查，尤其关注对校外实训基地运作成效及考核方式的评价。对“质量监控”，重点考查教学院（系）教学质量管理体系的完整有效状况以及教学检查与评价的信息反馈和改进机制。对“学习质量”主要以不同学校的同类专业之间可类比指标（省级学科竞赛）考核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三、校内专业评估的实操过程

1. 评估准备

首先，结合学校实际并考虑专业评估与其他类评估的差异拟定评估指标体系，并通过专业机构评审指标体系，证实其科学、合理、实用、可信。其次，加强对有关人员的培训，以便人们准确把握每个评估指标的内涵、观测点及注意事项。最后，学校、学院（系）要指导各专业评估负责人认真组织实施专业自评、准备迎评支撑材料、撰写专业自评报告。在此过程中，学校还要组织校内专家对自评报告进行客观性审查。

2. 评估实施

第一步是遴选专家。为了使专业评估结论客观、公正、准确、权威，根据省教育厅的推荐、结合学校实际情况，我们先后聘请了20位专家，其中多数是教育部聘任的评估专家，而且主要是外省的专家，专家组由国内知名专家担任。

第二步是函审自评报告。根据学科分类，各专业的自评报告电子版要发送给预聘专家进行函审。函审意见暂不公开，作为最终评审结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步是专家组进校现场考查。现场考查专家组共分成文、理、工、艺体四组。专家组根据指标体系，通过多种方式全面考查各专业建设情况，专

家组综合函评意见形成评估最终结论。

第四步是意见反馈。在考查现场，专家组对每个专业考查情况进行初步反馈，尤其对存在的不足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在学校召开评估意见反馈大会上，各组专家主要针对组内每个专业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揭示，并提出整改意见与建议。

3. 评估整改

根据专家指出的问题，结合专业实际，各专业负责人列出专业问题清单，提交整改方案。学校分类整理出学校层面的问题总清单和整改责任清单，责令各有关职能部门、学院（系）专业制定或修订整改实施方案。学校通过专题会议明确整改措施、目标、责任单位及时间要求。

四、有关专业建设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

1. 专业建设最首要的工作是搞好专业定位

专业定位是专业应对挑战、把握发展机遇的前提，也是确保专业可持续发展、培育专业特色的关键。从专业建设的实际情况看，专业定位工作不扎实的情况还很普遍。主要反映在专业定位及发展规划模糊，比较宏观笼统，而且专业定位缺少对社会需求的准确预测与跟踪。在确定专业定位时，要坚持比较性优势与功能效益性相结合的原则，既要利用自身在教学资源方面的优势与特色建设优势专业（群），也要找到专业与行业、企业在人才供需方面的良好结合点，促进在专业建设方面学校与社会的多赢发展。在确定专业定位前，认真做好专业发展的全面调研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广泛听取校友相关专业毕业生的意见，定期邀请行业企业相关领域专家参与学校专业设置评议与论证等。这些措施有利于避免专业建设的盲目性。学校定位影响校内专业定位，学校的多数专业或主要专业必须紧扣学校办学定位来明确专业定位。

2. 构造开放、多样的专业人才培养观

在经济社会发展处于“新常态”下，我们既要重构富有时代内涵的人才观，又必须接纳开放、多样的人才质量观。学校通过提升教学质量来保障人

才质量，但人才质量不等同于教学质量，也不是完全由学校说了算。由于社会资源（师资、设备、项目等）已进入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在评估中，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观测，除常规观测点外，还注重校友、地方用人单位、省内外典型用人单位的反馈信息。在大力推进校企合作等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过程中，校外教学场所的教学质量对人才培养质量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因此，必须充实原有的质量评价内容，对学生在这些场合的培养质量也要有确定的检测方法、手段，从而确保学生在任何场所的培养质量测量都有规可依。专业越贴近经济社会的需求，专业人才的质量观的开放性、多样性就越应该得到更多关注。

3. 专业课程体系优化与重构是强化专业内涵建设的关键

在教学实施过程中，课程体系是最重要的教学导向文件，也是教学资源对学生供给的内容清单。课程体系优化与重构时，不仅要考虑新型人才的知识结构，还要考虑其素质结构。考虑知识结构而设定课程时，不仅要优化不同类型、性质的课程的结构比例问题，还要考虑课程内不同教学方式的课时比例问题。课程体系既要结合行业产业发展的现实与趋势，又要突出社会需求与学生就业导向。既要认真考虑学科知识的完备性确定必修课程，又要能结合行业企业需求，给开发新课程留有空间。既要按有关规定设计好公共课程的总课时量，又要合理设定课堂内、课堂外的课时比例。创新源于实践，实践有益创业，强化实践能力培养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提升学生实践能力的有效措施是在构建实践教学课程体系的基础上增设或改增实践课程，加大实践教学课程的比例。如对有些实践性很突出的课程，要么改为实践课程，要么大比例减少理论讲授的课时，通过在现场讲学、实践，真正做到强化学生能力培养。

4. 校内专业评估是促进专业内涵发展的有效措施，应常态化

内涵发展、转型发展、创新发展是地方高校努力要做的工作，而专业内涵发展是重要基础。校内专业评估，对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进行全面审视，既重视专业建设过程，也重视专业建设效果，有利于不断改进专业建设。校内专业评估，功利性很小，能真正发现专业建设中被掩饰、忽视、潜在的问题。校内专业评估，既能因地制宜地制定评估指标体系，又能表现出学校专业建设方面的导向，既客观、公正，又权威、可行、可信。

五、结语

校内专业评估启动之初，无论是中层干部还是教师，大都不以为然。其原因既有对评估的成见，也有对校内评估必要性、可行性、客观性、权威性的怀疑。通过认真组织，评估结果使大家有“不评不知道、一评吓一跳”感觉，最突出的是学校根据评估结论而大张旗鼓进行的专业整改，彻底感动了每位教职工。

通过评估的组织与实施，无论是学校还是专家普遍感到，如何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中心”还是一个有待认真落实的问题。大家认为，无论是办学还是评估，我们都要更多地关注学生入学后的实际变化、收获与感受。

作者：郭国强 湖南文理学院副校长

来源：《中国大学教学》2017年第07期

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人才培养质量是地方大学的生命线

中国大学以公立大学为主，而公立大学分为部属大学和地方大学，其中地方大学约占全国高校总数的96%，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主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大学的教育质量直接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和未来走向。

现代大学肇始于欧洲中世纪大学，至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大学的功能也不断丰富和拓展，从中世纪大学强调“人才培养”到19世纪德国洪堡倡导“科研”与“教学”并

重,再到 20 世纪初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提出“社会服务”。近年来,国内外有学者还提出大学承担着“文化传承创新”“国际合作交流”等功能。

在大学功能日益丰富之时,大学因何而生、为何而立却变得日益模糊。从哈佛学院院长哈瑞·刘易斯提出“失去灵魂的卓越”到钱学森之问、钱理群之忧,中外教育学者都通过不同方式提醒我们,大学功能越多样,越要坚守本位,越要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

适应三个维度 明晰培养定位

地方大学人才培养质量影响我国高等教育总体水平。中国大学以公立大学为主,而公立大学分为部属大学和地方大学,其中地方大学约占全国高校总数的 96%,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主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大学的教育质量直接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和未来走向。然而,相较于部属大学,大多数地方大学在生源质量、师资力量、科研水平、国际化水平、文化软实力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如何有效提高和保障人才培养质量,地方高校往往面临着更大的使命和挑战。

地方大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需明晰人才培养定位。人才培养质量是与时俱进的动态概念,因社会、大学的发展而变化。评价人才培养质量有三种尺度:第一种是学校内部的评价尺度,主要评价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否达到学校规定的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称为“内适应”;第二种是社会的评价尺度,主要评价毕业生群体能否很好地适应国家、社会、市场的需求,称为“外适应”;第三种是学习者的评价尺度,主要基于学习者的学习体验和学习成效来评价,称为“个适应”。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办学自主权不断落实到位,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大学能够更加自主地选择发展模式,打造人才培养特色。因此,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地方大学首先要科学分析和预测区域人才需求,结合自身办学基础与优势,从内适应、外适应、个适应三个维度找准本校人才

培养目标定位,以此为起点论证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采用最适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与质量保障体系等,确保人才培养可规划、可执行、可检查、可分析、可反馈,避免人才培养处于“迷航状态”。

围绕立德树人 推进资源转化

地方大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需注重推进优质资源转化工作。加大教学资源投入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从内部看,要全面促进办学资源向育人资源转化。立德树人工作是大学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学所有的活动都应当围绕育人展开,大学所有资源都应当为育人服务。例如,在知识传授方面,苏州大学发挥学科综合优势,倡导“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通,实施分大类招生和跨学科培养,增强学生综合素养。在能力培养方面,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鼓励教师将学术前沿成果引入教学,促进本科生早进团队、早进课题、早进实验室。在价值塑造方面,注重“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相融合,引导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实践中增长本领才干。

从外部看,要注重促进地方资源转化为办学资源。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最终还是由社会来检验。地方大学不仅要基于社会需求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还要善于将社会资源转化为办学资源,服务于人才培养。如,近年来苏州大学与苏州市政府共同实施名城名校融合发展战略,双方共同实施“学科产业对接”“教育资源共享”等十大工程,促进学科专业与苏州产业深度融合。学校还加强与地方知名企业合作,聘请企业高管、技术骨干担任兼职教师,并与知名企业共建 300 多家实习基地、研究生工作站等平台,为学生成长提供“实战化”模拟平台。学校还将昆曲、园林、苏绣等吴文化引入校园,在传承弘扬吴文化的同时,提升学生文化修养和文化品位。通过校内外资源转化,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高,毕业生的社会适应能力与社会认可度持续上升,实现了学生、学校、社会良性互动和融合

发展。

完善监控体系 评价精准发力

地方大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需完善教学评价与质量监控体系。质量监控是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由于教学质量的多样性、滞后性等特点，传统教学评价过分注重“证明”功能而忽视“改进”功能，过分强调“总结性评价”而忽视了“形成性评价”“诊断性评价”。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教育正加速从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转变，更加尊重学生个体特征、学习兴趣和学习者体验。

面对新形势，地方大学要树立“以生为本”的教学质量评价观，构建在校生教学效果评估和毕业生社会评价反馈相衔接的全过程人才培养质量评估体系。在教学效果评估方面，建立全校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和评估系统，及时为学生提供学业预警与改进方案；在毕业生社会评价反馈方面，定期对毕业生和用人单位进行质量追踪调查，检视学校人才培养成效并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教学改革。

地方大学要实施“以数据为核心”的精准化评价，鼓励教学单位、教师利用大数据技术，全面而精准地掌握每位学生的学习基础、需求、风格等状态信息，筛选出影响学生学习成效的影响因素，发现表象背后深层次问题。我们要努力促进教育评价从“经验”走向“数据”，更加真实、客观地反映学生成长情况；促进评价方式从“总结性评估”走向“过程性评价”，更加重视评价的诊断、激励与改进功能；促进评价的主体从“单一”走向“多元”，以客观、全面、精准化评价，实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精准发力！

作者：熊思东 苏州大学校长

来源：《中国科学报》2017年09月14日

高等教育问责对本科教学评估的追问

随着新公共管理的兴起,管理主义和政府再造运动使问责获得合法性基础,问责既是核心工具,同时也是目标。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逐渐由官僚化管理向评估型转变,与此同时,社会审计文化悄然出现。从符号意义上来讲,问责作为一种社会手段已经俨然成为政府实现良好治理的标志,出现在诸多政策报告和规章制度中。在高等教育领域,为了提高教学和学习质量而进行的内部评估和评价活动一直存在,但是为了让大学就表现和成效向大众公开信息,伴随着国家层面问责体制和专门机构的建立,以外部评价和审核活动为核心的高等教育问责才逐渐规范化、常态化和制度化。

一、问责的概念与高等教育问责的内涵

1. 问责的概念与特征

问责是向他人报告、解释、证明和回答资源是如何使用的,达到了什么效果。问责需明确认识并解释如下基本问题:谁应承担责任,承担什么责任,向谁承担责任,通过什么方式,参照什么标准,将带来什么后果。问责的涵义可以从两个向度解释:一是作为一种目的和结果;二是作为程序、工具或过程。如果将问责视为结果的话,其关注重点就成为了不断提升的结果和效益,只有聚焦于质量改进、成果增加和提高、满足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行为方可增强问责效度。作为结果来分析的问责,资源使用过程问责与否并非是最重要的。作为过程的话,问责意味着一种关系,个人或机构被要求对自身的行为负责并做出解释,这种解释是在相关权威力量的监督、引导和要求下完成的。作为关系,问责是指行为主体和审查团体之间的关系,行为主体要向审查团体解释和证明其行为的合理性,审查者进而会摆出问题并做出判断,最终结果会对行为主体产生直接影响。问责本身已经不仅仅是教育体系的一个工具,而是成为教育制度的一部分,这也是官僚型政府向评估型政府转变的一个体现。

也就是说,问责是在特定关系和评估程序下为追求某种目的的一种社会实践,是将目的、实践和绩效表现制度化的过程。

莱文(Henry Levin)在对大部分问责分类进行总结概括的基础上,认为基本可以把问责的内涵分为四种:表现报告、技术过程、政治过程和制度化过程。对问责概念最直接的解释是将其视为表现报告,也就是学校或教育机构要进行定期报告,其背后逻辑是只有教育产出的信息公之于众,才能激发教育机构最大的发展潜力。通常情况下,教育机构的表现是与资金、教师和其他资源分配联系在一起。如果将问责视为技术过程的话,其假设是大家对教育的目标持基本一致的看法,问责过程就是不断处理其机制本身存在问题的过程,使其可以更有效地实现国家的教育目的,减少所需的花费和代价。与前两种不同,当问责被认为是一种政治过程时,就意味着不同团体在教育目的的看法和期待上存在不同的看法,其背后争执点在于教育是为谁、为什么群体服务的,为谁服务就要相应被谁问责。最后是将问责视为制度化过程,持该观点的人认为,教育中的问责是阶级再生产和个体社会化的工具,它服务于少数掌权阶层,将学生赋予消费者的角色偏离了教育本身追求。

2. 高等教育问责的内涵

从国际范围来看,对大学进行问责已经成为推动高等教育发展和提高国家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方式,在实践中更多呈现出外向问责的特征,即高等教育问责过程是对院校资源输入、过程和结果产出相关数据和信息的系统收集过程,它反映的是使大学组织和个人行动指向既定期望的系统工具,评估是问责的主要形式,也是质量保障的基本路径之一。

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持续关注是问责的主要原因。首先是高等教育体系的急速膨胀和学生人数的上涨;其次是公共财政的紧缩和对大学拨款的相对减少;最后是伴随着向知识经济的转变和高等教育

市场化趋向，高等教育发展被有意引导到国家经济发展需要或市场需求的方面来。这意味着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高等教育的高速发展莫维奇；展驱动政府出台和实施高等教育保障或评估政策。高等教育问责情境中的质量观更多体现的是遵守规范的要义，即大学只有遵守特定标准和规范才能实现质量保障，在可测评的标准体系内，取得成绩越高则证明质量越高，反之，则要对照这些规范反思自身的不足，以求逐步弥补和完善，进而证明自己提升质量的过程、措施和结果。在这种逻辑下，界定大学质量的重心就放在了所设定的规范、标准和指标体系上，质量保障这一术语实质上等同于质量控制。

从目前实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的国家来看，基本存在一个共有的模式，其中有五个因素：第一是一个独立的审核机构作为整个问责系统的协调机构；第二是自我评估，这是让大学主体接受质量评估进而实现评估目标的关键要素；第三是同行评估和进校考察；第四是关于评估的公布；第五是评估结果与政府财政拨款的关联性，也是政府对高校问责的核心特征之一。

二、高等教育问责的主要取向

罗姆泽克（Barbara Romzek）根据问责对象自主程度的高低和衡量表现的标准来源，将问责形式分为四种：官僚问责、法律问责、专业问责和政治问责。除此之外，在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下，市场问责也成为了教育领域问责的一大趋向。其中，法律问责和政治问责由于是问责的基础和共性，因此不再展开赘述，本文将主要集中于官僚问责、专业问责和市场问责，这三点也嵌于高等教育问责的主要议题与学术讨论中。

1. 官僚问责

官僚问责，又被称为是行政问责，是指问责对象受到严密的监督，拥有较低的自主性，同时要面对内部控制。其内含是监督——从属关系，一般

适用于稳定的环境且简单的管理结构中。这种方式下，期望的管控来自于科层结构中顶层或上级的管理者。官僚问责体系之所以能有效发挥作用是因为：在上下级合法正当的组织关系中，听从命令被认为是天经地义、无可争议的；这种监督体系中存在标准的操作程序或明显的规章制度。根据外部力量在重要决策上影响力的强弱、上下级之间信息交流的顺畅与完整度、决策的清晰度和合理性层次，官僚问责会显现出强弱不同的问责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公共管理的影响下，社会的公共组织纷纷借鉴或采取了私人领域的管理风格，即强调绩效管理和问责，这种现象不仅体现在原有的政府官僚科层体系中，在大学中亦如此，这种新的问责形式也被称为“管理问责”。

2. 专业问责

比起官僚问责和法律问责，在专业问责和政治问责中，问责对象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专业问责和政治问责的分野在于二者问责标准的来源不同，前者主要依据内部的标准和判断，而后者要对照外部标准。专业问责的前提假设是教师活动是复杂的，凭借既定规则制度来进行管理的官僚问责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个体或机构拥有较高的自主权，可以根据内在价值决定自己的行为，内化的观念价值和行为准则影响最大。该问责制度的假设是专业人员如果达不到工作绩效期望，就可能会被责难或离职，所以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专业人员会有较大的自由灵活性，关键是要对机构和组织的专业技术规范保持顺从的态度。专业问责是指教师作为专业人员，在群体专业性的感召下使其感知到要坚持和遵从专业规范的责任，主要是指在专业组织中通过发挥专家监督和同行评估的作用来实现质量保障和使命达成，侧重于组织的内部控制和专家的决策权，是建立在外部的上级管理者对专家学者的信任基础上赋予的权力，使其能自主独立地做出重要决定。

3. 市场问责

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市场问责也成为问责的一个重要维度,其根基是学生和家长对院校的选择,所以也被称为是消费者问责或学生问责。市场问责的逻辑就是能吸引到学生或好学生的学校就是好学校;反之,学校的质量可能会差强人意。它问责的前提假设是消费者们具有信息生产的途径,市场问责是通过消费者的直接参与实施的。问责主体与被问责的院校及老师之间形成了一种社会公认的默契的契约,问责的过程就是检视和监督契约达成的过程。市场问责的形式主要是各种以学生为主体的评估和国际排名,评估结果和排名情况会影响学生对大学的选择意向,进而倒逼大学进行改革。从英美澳国家的实践情况来看,以学生为主体的评估有美国的全国学生参与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 NSSE)、澳大利亚的毕业生去向调查(Graduate Destination Survey, GDS)中的课程体验问卷(Course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 CEQ)、毕业生技能评估(Graduate Skill Assessment, GSA)等。这些评估都是旨在搜集学生和雇主对在学经验、学校满意度和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的信息,服务于内部服务改进和质量提升。而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国际大学排行榜,如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QS排名、上海交大排行榜、美国《新闻周刊》世界大学排行等,侧重于在全球范围内对大学的教学、科研、国际化程度等综合指数进行考核,这种关系到大学声誉和学生择校的外部排行榜已经对大学产生了愈加强烈的影响。就大学中的两大主要活动——教学和科研来说,大学主导的学生和雇主评估更多地服务于教学实践,而外部机构主导的国际排行对大学科研活动发挥的作用机制更为清晰。

在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中,国家(政府)、学术

和市场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同样,将这种三角关系放置在高等教育问责的框架中,就呈现出官僚问责、专业问责和市场问责的维度,起主导作用的一方决定着某一高等教育体制问责的风格与趋向。总的来看,政府控制资源下的问责和市场导向问责呈现出愈加明显的趋势,而以学术关怀为主的专业问责处于不断消退的尴尬境地。

三、影响本科教学评估政策效力的制度与环境因素

随着本科教学评估政策的不断演进,我们更要关注和反思政策直指的目的是否能够如愿达到,在此过程中院校所处的内外生态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大学中的核心主体教师和学生是否真正实现了“内涵”发展。也只有透过这些追问才能对政策的真实情况有深刻的了解。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一项生态系统,相互掣肘,环环相扣,因此,本科教学评估政策在实施的具体过程中会受到来自于大学治理结构与环境、教师聘任制、学术群体文化和组织变迁等多方面的交叉影响,故而呈现出与政策制定初衷不一样的实践样态。以下将围绕三个问题对影响本科教学评估效应显现的因素进行探索。

1. 问责制度能否增进公众对大学的信任

首先,问责和信任是否处于对立面这一问题值得思考。尽管很多问责体系声称是为了提高和促进信任构建,但在实践中很少谈及如何实现信任重现。斯腾塞科(Björn Stensaker)从两个理论视角分析了该问题。第一个是理性工具角度。认为信任是基于问责关系中的主体双方,在此过程中程序、标准和规定都由审查员制定,而审查主体的信用是社会所公认的,评估标准由问责机构制定,而信任是基于问责机构的权威上的。第二个是规范认知视角。信任是建立在大学自身强有力的内部规范和外部审议机构对其自治期待基础上的,最重要的基石之一就是大学章程。本科教学评估实施的原因之一就是社会和政府对于大学的办学质量与教学效果的担忧与不信任。分析新

一轮的本科审核评估政策，可以看到其试图从理性工具向规范认知进行转轨，由政府制定硬性评估指标向强调院校自评和自我目标设定过渡，政府、评估机构和大学之间的信任关系构建也从首轮评估的“刚性”手段转向“柔性”，但在路径依赖和组织惯性的因素影响下，社会大众对大学的信任危机并不会随之立即解除。

社会与大学之间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传统的教育伦理道德，这也是传统意义上大学治理所倚赖的重要隐形力量。然而，在经济理性和新公共管理的驱动下，大学治理中的市场行为和管理技术逐渐强势。在新时期，传统的“道德治校”在大学文化、战略规划、人事管理等方面遭遇了危机，大学中公平、求真与纯善等价值式微，这直接导致了长久以来公众与大学形成默契的高度信任体系面临坍塌。教育中的伦理道德关系代表着一种心照不宣或达成共识的规则和责任关系，那么问责文化影响下的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其中最主要的改变就是大学、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学校和教师被要求要按照“客户（学生）”的要求去做，满足学生的要求；大学被要求按照“客户（政府）”的要求去做，遵照其制定的规则。其结果就是教师越来越难以按照自己的专业判断来行动和实践，这也是市场问责趋向带来的潜在影响。从家长和学生角度来讲，他们潜在被推向“消费者至上”的位置，对教师和学校专业性的依赖度和信任度大大降低，所以要求政府来执行问责。问题是政府在问责中所关注的主要是教育质量和教育服务的提供及分配，而非家长和学生的主观需求。在政府和学生的双重压力下，教师和学校陷入了“难以发声”的困境。

公众对大学专业精神的信任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内部信任的，即这种信任存在的社会资本是大学内部同僚间知识的分享，创造和运用知识的集体行为。信任是大学学术专业文化发展的必备核心要素之一，而基于不信任的问责会产生更多的不信

任。诸多研究也集中于去探讨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是否真正发挥了问责的信任作用，有评论认为其在一定程度上为公众了解大学情况提供了信息通道，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的信任问题，而是变成了一种“控制的控制”。从根本上来讲，这种信任需要的是大学自治，需要构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问责机制，可持续发展是指从规范视角而非单向权威遵从出发、从大学自身发展视角和立场出发、从大学的主体教师和学生切身利益出发实现的循序渐进式发展。这样的问责机制不应该是服荫于单方利益体的标准，其标准制定应该是在政府、大学和市场三者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尤其要以大学发展立场为本形成一套规范明晰的行动参照体系，这也是中国当前强调大学章程制定之重要性的体现。大学章程应当是大学内部治理和对外建立信任度的重要依据，章程的制定要符合大学发展规律，同时还离不开认真“按章办事”，落到实处而非一纸空文。这项“大学宪法”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根基，当前仍然面临“难产”的困境和多重阻力，这种大学治理依赖制度的缺失也成为了制约教学质量提升和大学信任实现的重要因素。

2. 教学评估能否真切提升教学质量

在没有问责之前，学者的学术忠诚倾向于基本的学术单位或学科本身，而非今日的大学利益。除少数学科外，大多数的学术工作都是独立完成的。但在新公共管理方式下，学术人员身份已经不再仅仅是学术卓越的追求者，还要对自己的科研产出、成本花费、绩效等进行管理。尽管不少学术人员对这种变化表示反对和抵制，但他们已经被赋予了一定的管理人员职责和身份，亦或是某些学术人员承担了管理职务，这些人员就要不断学习和适应新公共管理的逻辑和方法。学术工作者作为专业人员的角色开始出现分离、切割和多重化，部分转化为“学术经理人”（manager-academics / academic manager），部分成为“被管理的学者”（managed a

academic)。前者是指其已经将商业管理体系的价值、目标和工作模式内化于心，如强烈的科层体系管理、财政预算控制、收益最大化、商业化和绩效管理指标等；后者是指坚守自己的学术专业，坚持自我管理、同僚管治、学院式实践和教育标准和规范，这造就了学术人员角色的分裂。这种分裂不仅反映了管理权威在大学的科层结构中日益固化，而且凸显了学术人员自己通过内化管理意识，将其作为一种交付的权力和主导途径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地位或职业升迁等。

从学术经理人的立场出发，其角色有两个特征：一是在提升大学的效率和生产力的合理背景下，他拥有合法权力把其他学术人员当作下属雇员去管理；二是大学的核心特质和成功依赖于商业价值和市场理性。相反，从被管理的学者视角来看，他始终坚持自己是自主的专业人员角色定位，同时以自身对学术自主的理解、观念和实践路径来反对管理主义的做法。关于大学教师对问责的态度方面，特肯（Christine Teelken）用三个术语描述了三种不同的态度：符号顺从（symbolic compliance）、专业实用主义（professional pragmatism）和正规工具主义（formal instrumentality）。符号顺从者是指教师表面上顺从管理上的变化，但传统学术生活方式却深植于内心，与新公共管理保持最大的距离或是持一种深度批判的态度；专业实用主义者倾向于一种实际的态度和做法，将问责带来的变化看作是理所当然要发生的，对待新的管理方式持一种批判但认真对待的态度，他们认为自己是学术专业人员但也并没有完全“超然于世”；而正规工具主义者意味着用最为积极乐观的态度看待问责，依赖于这种常规的安排和工具手段，如认证或质量保障制度等，缺乏批判的视角。

简而言之，当前显著的学术生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科研高于教学；二是学术人员的角色

复杂化和分裂。两者相结合形成的组织文化和环境对教学发展形成制约。当前，在大学职务晋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研产出而非教学卓越或付出。一方面，科研评估相对于教学评估简单客观，教学质量评定标准至今仍是国际难题，具体体现在谁来评、评什么和怎么评这三大问题上；另一方面，快速发展的知识信息社会和创新驱动的国家经济，大学的社会功能或国家立场中的大学定位，科研超越教学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集体利益。在这种大环境下，有的大学明确设定了教师分流分轨制度，如教学岗、科研岗、教学科研岗、社会服务岗等；有的大学则是隐形的存在一些制度，如专注科研教师不必教学，几年内无需教学等。造成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教学生存发展环境的恶化，这种环境不仅是指人事制度环境和奖惩体系，更是一种话语环境对学术群体和大学文化带来的阴影。无论是显性还是隐形分岗，都是教师角色和身份甚至地位不断分化的过程，分化着学术社群的整体性、凝聚性和纯粹性，尽管这符合社会分工不断细化的社会发展规律，但在传统惯性较大和演进轨迹较慢的大学中，在大学始终把人才培养工作视为重要部分上，教学渐渐丧失了功能发挥的硬环境和软环境。在硬环境上，教师对教学投入的时间、精力和动机等都有所下降，奖励体系和晋升渠道都远逊于科研；在软环境上，教风学风在社会功利和市场诱惑下提振不佳，不少教师将其视作第二或第三序位活动，不同角色身份的教师分化着组织文化的统一性。这其中体现出的是新公共管理文化与学院文化的冲突，矛盾之下也呈现出大学对学院文化回归的呼唤，尤其对于教学来讲，学院文化才是支撑其走向卓越的适当环境。这意味着关乎教学质量的评估改进不仅是自身评估制度问题，更是牵涉整体高校科研管理制度和人事制度的问题。

3. 如何协调多方利益牵涉的问责格局

从英美澳三国的高等教育问责体制可以看到多重问责的交织以及演变。英国传统上以院校自治

和自我评估为主，新公共管理风行后，在质量保障署和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的主导下，全国范围内的院校审计、科研和教学评估开始逐渐规律化和制度化。美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高等教育认证制度，由高等教育认证理事会下辖的六个区域性认证机构负责，同时还有范围较广的全国学生参与调查。澳大利亚问责体系中，大部分事务由2011年新组建的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署负责，同时联邦和州政府对大学的财政事务、质量绩效和学生产出方面也非常关注，还有多元复杂的学生参与式评估。

总体而言，这些国家的问责机制呈现出管理问责不断加强、专业问责不断退化的现象，即强势管理文化对大学原有传统学院主义文化的不断挤压。从问责类型构成来看，既有政府部门参与的财政与拨款绩效问责，也有第三方机构主导的以院校自评和同行评估为主的院校审计或认证，同时还包括从学生发展立场出发的多种评估，如参与度评估、大学体验评估、教学评估、毕业技能评估、就业评估以及雇主反馈等。在官僚问责、专业问责和市场问责中，各方利益牵涉均得到不同类型和程度的回应。不同的国家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和趋势。英国学界对新公共管理对大学传统管理方式、大学文化和学术社群造成的冲击不断进行批判，因此，近年来有逐渐回归专业问责和关注教师学生根本发展利益的倾向，但在财政压力下，大学的市场化导向在大学管理者和普通教师之间造成的冲突还在持续，市场问责仍然强劲。美国在分权制和大学自治的传统上，政府对大学干预一直较少，高等教育发展也一向缺乏相对统一的全国框架和实施计划。但州政府对大学，尤其是公立大学的问责呈现出愈发强劲的态势。澳大利亚的问责格局自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署成立后，统一化的管理风格日趋显著，更加关注大学的风险评估，而不是单纯的结果和绩效评核。

无论如何变迁，这三个国家不变的是在问责过程中相对坚持大学的主体性、自主性和能动性，坚

持教师群体的发声机会和发展权益，坚持学生的主体地位，相信教师的状态和学生的在学经验体验是关系高等教育质量的根本点。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政府对大学的问责形式占据问责格局的核心和主导位置，专业问责和市场问责相对较弱。但从新一轮的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来看，淡化了政府色彩，强调专业性和同行评估性，强调大学自评和以大学自己的尺子量自己。不少大学、大学联盟和地方大学开展的学生参与的质量评估也开始逐渐发展，这种以“消费者”视角出发的评估就是市场问责的体现。也就是，中国的高等教育问责格局也正在由单一的官僚问责向官僚问责、专业问责和市场问责相融的机制演进。这不仅是新时期下大学强调共同治理的必然路径，也是回归对大学两大主体（教师和学生）的发展予以关注的重要体现。专业问责和市场问责在持续推进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和世界流大学建设中，会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作用。在本科教学评估制度的不断优化过程中，上述三种向度问责如何组合、化解矛盾和不断平衡将会是未来改革的关注点。对于教学评估和教学质量提升来讲，教师与学生是绝对的主体，这也是其不同于科研评估的重要一面，因此，专业问责与市场问责的参与方式与优化路径将不断考验本科教学评估制度设计的走向与效应如何。在中国评估制度日臻成熟的进程中，问责的强制性、与院校发展不契合和多方利益主体的矛盾将不断缓和，而大学的自我问责能力构建、问责的自觉性和内部问题解决能力将逐步提高，这也日益凸显了大学构建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性。回应前文莱文的观点，中国的本科教学评估正经历着技术过程及背后的政治过程。技术过程就是如何不断优化评估办法，在节约成本和内耗的基础上实现质量提升；政治过程则是在大学治理所关切的多方利益主体格局中，不断处理矛盾和冲突。这也是反映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改革难度相应增大。对问责这一议题来说，上述技术问题和利益问题也是世界性的。

四、结语

高等教育问责的不断演进与新公共管理的影响密切相关，在大学中呈现出管理权威复兴的现象。高等教育管理在管理意识形态繁荣和国家评估的不断挤压下，科层化日益严重，尤其是对于那些传统上实行大学自治和拥有浓厚学院文化管理风格的国家来说，这种变化幅度尤其明显。在伯克（Joseph Burke）的问责三角中，借助拉克的高等教育治理三角理论来阐释问责过程中的力量博弈，从当前各国高等教育问责政策的演进趋势来看，问责力量和焦点继续向政府优先事项和市场一方倾斜，学术关怀不断消减。简而言之，就是管理型问责和市场问责趋强，专业问责趋弱。

在多重评估与质量保障体系下，对大学及教师的专业信任尚未完全获得认可。重塑学术人员的专业自信不仅需要外力驱使，更需要从根本上构建赋权于学术人员生长的环境和制度。如同国家治理需要刚性的法律和柔性的道德一样，大学与公众之间的信任也需要进一步赋予教育伦理道德与大学自我规范的治理空间。这种治理赋权一定程度上是要打破当前高等教育仿市场运行中“消费者至上”、“大学公司化”的理念和思维，重新思考大学作为社会思想高地和批判中心应该发挥的作用，寻找大学真正实现内涵式发展应该依赖的基点和核心，将大学章程制定和实施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石。从另一层面上讲，本科教学评估政策的不断深入也是与中国高校人事管理改革和聘任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这其中，缠绕着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冲突与协调、教授治学等议题均是对专业问责的回应。

作为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重要一环，本科教学评估在新一轮审核评估中，强调学校主体和内涵建设，从组织机制上讲仍然是政府主导下的问责制度。从政策研究的角度来讲，我们必须发问究竟是什么因素对政策实施的效度构成了影响。本科教学评估政策的设计和实施要以整体高等教育的

问责制度和环境为重要背景来考量，脱离了整体学术生态、大学治理结构和晋升制度的政策注定会出现实践鸿沟。随着问责制度的不断成熟和发展需求，大学作为真正的社会文化中心和批判功能的发挥将需要专业问责的引入，需要学术团体专业精神对大学治理环境的参与，需要学生的参与。只有充分尊重和利用大学教师作为专业人员对大学共同治理的贡献，尊重学生的发展权益，才能更好地重塑学术圣洁和公众信任，使大学的传统理念和精神得以保留与传承，实现问责作为质量保障的一种途径所能达成的真正目的。而目前来看，其实现的时间表将越来越倚赖于其他制度改革的进展情况，倚赖于整体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进程与质量。

作者：宋佳，黎万红 香港中文大学

来源：《高教发展与评估》2017年03期

地方新建本科院校特色发展之路探索

经过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后的新建本科院校都明晰了办学定位，在教学管理、师资队伍、教学条件、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目前正依据国家推动部分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要求，从“新建”向“新型”发展阶段迈进。在新的发展阶段，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才能使新建本科院校形成较强的竞争力，承担起我国高等教育强国梦赋予这批院校的历史责任成为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本文分析了合格评估后新建本科院校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探索提出了新建本科院校6条特色发展之路。

随着我国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以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为己任的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显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国家对地方新建本科院校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在宏观政策领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指导和支持政策，为新建本科院校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和政策环境。2015年11月，教育部、发改委、财政

部联合发布《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转型指导意见》），成为合格评估后国家引导、推动新建本科院校向“新型”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重要举措，这必将使新建本科院校发展获得更多的政策红利。

经过合格评估后的地方新建本科学校在发展中也面临两方面的挑战：第一、学校职能从过去相对单一的人才培养为主，向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五大职能转变，以更全面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二、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重心从“三个基本”（办学条件基本达标，教学管理基本规范，教学质量基本保证），向“五个度”转变（“办学定位与人才培养目标的社会适应度、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度、教师与教学资源的保障度、内部质量保障体系运行的有效度、学生和用人单位的满意度”），加强学校内涵建设，走特色发展之路成为主要任务。

面对新的发展阶段的机遇与挑战，本文结合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实践，探索提出以下6条特色发展思路。

依据“地方需求 + 国家战略”确立特色定位

地方高校的发展既要立足当前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又要瞄准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国际化发展的前沿和趋势。《转型指导意见》已经明确，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转型之路就是“地方性”“应用型”之路，就“需求导向”之路，就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之路，这应该是学校办学定位的基础。但是，地方的发展和国家战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地方发展是服务于国家宏观战略布局的。因此，在确立新建本科院校的服务面向定位时，不仅仅要关注地方眼前和局部的发展需求，更要关注地方在国家战略布局中的位置和分工。只有考虑国家未来发展的需求，才不至于将学校局限在一个较狭窄的视野。特别是西部欠发达地区，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企业、社会支持新建本科院校发展在经济能力比较有限的情况下，从国家战略中寻求支

援，才能使学校发展获得充分的资源，同时突破毕业生就业的局限性，也才能使学校人才培养具有持续的竞争力。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原琼州学院）是2006年由师范专科院校升格为本科院校。近年来，学校根据海南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国家战略需求适时转型，在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中找到了自己的地位和发展机遇，顺势而为，向热带海洋类高校转型，于2015年更名为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校将服务面向定位为“面向南海、面向东盟、面向国际旅游岛、面向产业发展需求”，建设一所“国际化、开放性、应用型、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热带海洋类高校”。广西钦州学院是由一所师范专科院校于2006年升格为本科院校，在国家实施“海洋强国”和“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学校确立“立足北部湾、服务广西、面向全国、辐射东盟”办学面向定位，服务我国北部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战略的需要，着力打造“区域性、海洋性、国际性”办学特色。

这两所学校的主动调整办学定位，都使学校由原来的一个普通的地方综合性本科院校，成为承接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行业需求、肩负特殊历史使命、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地方特色本科院校，走出了“地方需求+服务国家战略”的发展道路。

根据区域经济发展需求，构建特色学科专业

一所大学的学科专业特色往往是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形成的。但是新建本科院校由于本科办学历史短，学科专业建设一方面受原有专科专业基础和师资的局限，延续了原有的学科专业；另一方面新增专业明显带有“模仿”和“跟随”老牌本科院校的痕迹。这导致许多地方高校专业设置过于雷同，人才培养呈现结构性的“产能过剩”。因此，要培育和塑造学科专业特色就必须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行为，增强转型的紧迫感和加大转型的力度。例如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紧紧围绕学校办学定位和转型发展的方向，及时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将学

校特色重点学科方向由原来的“师范、民族”适时调整为“海洋、旅游、民族、生态”，重点培育海洋特色学科专业群，“围绕海洋科学、海洋人文历史、海洋旅游、海洋管理、海洋食品、海洋信息等六大重点建设的方向和领域构建学科专业体系”。同时，学校加大专业转型和建设力度，将原有12个普通专业向海洋方向转型，实现了由普通专业向“专业+海洋行业特色”的应用型专业的转型。

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类型定位，打造特色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是新建本科院校走特色发展之路的必然选择。以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旅游管理人才培养为例，通过创建“国家或地方行业主管部门+教学科研基地+学科专业平台+产业”的协同模式，使旅游管理人才培养走出了一条“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成功模式。学校旅游管理学科和专业不仅服务于旅游产业的发展，同时服务于海南国际旅游岛战略及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学校借助国家教育部的“教育援外基地”平台，致力于打造我国旅游管理高层次人才教育培训基地，聚合国内外旅游管理高端人才，为发展中国家培训旅游管理高级管理人才，不仅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了人才，同时又开拓本土旅游管理人才的国际视野。学校还与海南省科技厅、省旅游委、三亚市等单位共建旅游协同创新中心，与省及有关市县旅游协会、企业共建实习实训基地等，构建了“政产学研用”相互融合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和产教深度融合的人才培养机制，为地方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应用型旅游管理人才，学校也获批了“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成为我国唯一一所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培养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新建本科院校，打造了应用型学科专业建设和旅游管理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品牌。

培育新建本科院校的特色文化

大学灵魂在于大学文化。作为共性的要求，

中国大学应该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文化；树立办学以教师为主体，教学以学生为本位的教育文化；建立依法治校的制度文化，教学为中心，服务教学的管理文化；建立鼓励创新的创新文化等。在此基础上，还要培育与大学的学科专业特色和特殊使命相结合的特色文化。例如，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就是通过建立南海文化博物馆、民族文化博物馆，开发海洋特色教材、黎族文化特色教材、民族特色文献资料库、旅游特色文献资料库、海洋文献特色资料库，开设海洋特色课程、民族特色课程等来彰显学校的海洋特色文化、民族特色文化。通过将海洋文化、民族文化等引入课堂、博物馆、校园的每一个宣传窗口，融入到学生生活学习的每一个环节。同时，海南热带海洋学院通过加入蓝丝带行动和各种社团活动，将海洋强国梦融入到学生的各项活动中，增强了学生对保护海洋、爱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学校实践表明，培育大学的特色文化，不仅有利于形成办学特色，增强办学活力，同时也可以引领地方文化发展，促进社会文化繁荣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建立一支专兼结合、理论和实践并重的特色师资队伍

在近年本科教学合格评估专家的评分及全国新建本科院校教学质量检测报告中，“师资队伍的数量与结构”指标特别是“队伍结构”观测点在所有评估指标中是得分最低的。可见加强新建本科院校教师队伍的建设是一项十分关键而又艰巨的任务。新建本科院校由于基础弱、高水平学科平台少等原因，引进高水平师资面临较大的挑战，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师资队伍建设面临更大的困难。因此，仅靠刚性引进很难拥有一流的高层次人才，当前必须走刚性引进与柔性引进相结合、专兼职相结合的道路。同时，在国家发展战略中要积极争取国家的人才政策的支持，加快高层次人才的培育和引进。

通过本科教学合格评估，新建本科院校对加

强“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建设的意识明显增强，并促进了“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的建设。但是，具有行业背景的高水平“双师双能型”教师仍然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必须弥补的一个短板。目前的教师队伍中，绝大部分是缺乏行业背景的“学院型”教师，对社会、对行业的了解不深、不透，而外聘的部分行业教师，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理论水平和教学经验比较欠缺。因此，一方面对学院现有教师要加强培养培训，组织他们定期到行业企业挂职锻炼，鼓励教师与行业企业合作开展研究，不断提升他们的实践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对从行业和企业聘请来的兼职教师，要加强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的培训，使他们了解教育规律，更好地履行兼职教师的职责。学校只有培养出一批既有教师素养又有行业资质（如工程师、会计师、医师等）素养，既有理论教学能力又有实践创新能力的“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才能适应新建本科学校的定位，走出特色发展的道路。

建立开放合作的特色体制机制

新建本科高校由“新建”向“新型”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政府、学校、社会、企业等各个方面，每个方面都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国家已经明确了发展方向、并给予政策和经费支持的背景下，学校必须主动推进，积极作为。首要任务是建立起开放合作的体制机制，走政产学研合作教育之路是特色发展的必然选择。

例如，海南省于2010年正式确立了由省和三亚市共建琼州学院（现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省市共建体制机制，学校建设过程中得到了三亚市政府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办学活力明显增强。2014年学校又成功申报国家大学科技园，依托这一国家级科技创新孵化平台，学校积极鼓励、推动广大师生走科技创新和自主创业的道路，并将科技型企业引进校院，走出了一条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途径，科技成果转化和学生自主创业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学校正积极推动成立理事会，通过理

事会更好地统筹政府资源、社会资源和市场资源，凝聚发展动力，共同为应用型海洋人才培养以及国家海洋强国梦、海洋强省梦的早日实现而做出积极贡献。同时，正在组建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发展联盟，通过省内省外、社会各方参与办学，创新体制机制，形成“协同办学、协同育人、协同创新”的三协同办学模式，真正实现开放办学、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运行体制。

作者：过建春 海南师范大学副校长

李志宏 教育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2017年12期

美国大学如何提升本科生的学习质量

——基于“大学学习测评项目”的经验与启示（上）

摘要：美国“大学学习测评项目”（MCLP）从专门学科的角度，集中阐述了六个学科领域内 21 世纪的大学本科生应具备的基本知识与必需技能，勾勒了美国大学本科生学习质量管理的关键要素，对我国高校进一步明确本科专业教学质量标准、推动教师有效改进教学、提升学生学习质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本文从发起动因、核心原则、组织与实施、成果特色等方面介绍了“大学学习测评项目”（MCLP）的推进过程，并结合实际，从如何科学设计专门学科的学习结果、开展学习结果评价的专题培训、综合运用多样化测评工具、重视教师对教学评估的主动参与等方面，对我国高校如何有效提升本科生的学习质量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学习结果评价；本科教学；美国

引言

如何提升本科生的学习质量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美国“大学学习测评项目”（Measuring College Learning Project，简称 MCLP）始于 2013 年，是一个由纽约大学社会科学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简称 SSRC）牵头，由全美多个学科协会共同参与的科研项目。该项目旨在推动同一学科领域内的教师参与到学生学习结果的界定及其评价中，针对生物学（biology）、商学（business）、传播学（communication）、经济学（economics）、历史学（history）、社会学（sociology）六大学科领域内本科生学习结果评价指标及其有效提升措施而展开。历时两年，MCLP 于 2016 年发布了《提高美国的高等教育质量——21 世纪的学习结果及其评价》（Improving Quality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Learning Outcomes and

Assessment for the 21st Century）一书，发布了该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与以往的学习结果评价项目不同，该项目从专门学科的角度，对六个学科领域内大学本科生在 21 世纪应具备的基本知识与必备技能及其有效评价方式进行了集中阐述。该项目不仅展示了美国大学本科生学习质量管理的总体框架与关键要素，而且勾勒了美国本科专业教学质量评估的未来发展趋向，对我国高校明确本科专业教学质量标准、推动教师有效改进教学、提升学生学习质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MCLP 推进的主要动因

（一）回应高等教育质量问责的需要

政府与社会对高校的质量问责无疑是 MCLP 展开的首要动因。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随着美国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张，有关教育质量和学生学习成果的话题已经成为各州政策讨论的重心。各利益相关者都在纷纷质疑大学教育的价值，社会问责的呼声持续高涨。尤其是面对不断上涨的学费、经济大萧条、下滑的毕业率以及学生批判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不佳等现实问题，社会各界要求全美的学院和大学，都必须用高效的方式收集并向社会公众公开学生学习成果评价的相关数据。为了回应社会各界对教育质量下滑的广泛问责，政府、学校、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纷纷投身于各种评估项目，促使学生学习结果评价在美国高等教育界得以深度地被重新讨论和实践推行，社会各界都在积极思考如何回归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本位传统，如何为学生提供与高等教育使命相匹配、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个人发展需求相一致的教育。

（二）现有的学习评价工具存在局限

在未来的全球化世界中，高等教育的价值在于帮助学生实现自己的职业期待，它提供给学生的不仅是职前培训，而且应该是能够帮助学生做好参与民主社会生活的准备；不仅要为他们个人成长和

发展提供丰富的综合素质储备,而且应该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和探究的热情,帮助他们获得实现职业长期成功的高阶技能(higher order skills)和态度。与专门的工作技能相比,批判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等高阶技能,是雇主们对毕业生的核心能力要求。在科技迅速变化的时代,高阶技能能够帮助毕业生应对个人、社会和专业等方面的各种挑战。立足高校学生学习结果评价的现实需要,尽管不少测评机构相继研发了侧重点各异的学习评价工具,但是这些工具在精准测评高等教育的价值时,都存在一定的不足。例如,美国教育部曾相继推出了“大学记分卡”(College Scorecard)和“大学排名计划”(College Ratings Plan)。但是两者的功能都受到了各界的质疑,且“大学排名计划”很快就被大学管理者取消了。因为不少的大学管理者认为,高等教育具有的唯一价值是帮助学生获得紧俏且收入高的就业机会,而这些举措“主要吸取了初等和中等教育的经验,缺乏对高等教育未来的长远思考,没有考虑到高等教育自身的特殊性”。

(三) 专门学科的学习结果及其测评工具相对缺失

在美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中,往往忽视了倾听一线教师的意见和建议,造成了公众对高等教育的核心功能——学生学习的不够重视。近年来,虽然美国不少测评机构已经开发出了相对成熟的工具,用于评估学生的批判思维等通用能力,但是针对专门学科的学习结果及其测评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针对专门学科的学习结果侧重于基本知识内容或基础抽象概念等方面,这些学习结果既无法实现教师的教学目标,又很难契合高等教育各利益相关者的发展诉求。学科是大学运行的基本单位,尽管美国的本科教育以通识教育为基础,但是在大三、大四年级阶段,本科生仍然是在某一学科专业内完成相应的学业。如果以专门学科的学习结果测评为抓手,教师更容易评估学生真正学到了什

么知识、具备了什么样的能力,更容易运用有效的评估工具和方法以提高学生的学业完成率,更容易制定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举措以有效改进教学;院校可以更深入地推进教学改革,节约时间成本和财力成本,提高本科生的学业完成率;而学生也可以更好地在劳动力市场上向雇主展示相应的技能和素质,雇主们也可以从各类高等教育机构中甄选出适用的人才。因此,如何规划并设计专门学科的有效学习结果及其测评体系,显得迫切而重要。

二、MCLP 的核心原则

(一) 教师是本科生学习结果标准界定和测评的主体

美国大学内部学生学习结果评价活动主要由教师来设计、实施,而不是自上而下地进行。在专业层面上,教师既要明确学生学习该专业后所获得的特别技能、价值观和态度,又要围绕学生学习要完成的结果,为学生提供怎样的学习过程、学习方法,确定数据采集的实施方案等问题设计评价计划;既要依照评价计划具体设计、实施评价,又要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在课程层面上,任课教师既要明确学生学习该课程后所应掌握的相关概念和技能,又要明确学生知识学习和技能发展的具体表现和行为;既要确定评价的时间、方法,也要及时进行反思、改进,以调整自己的教学。同时,教师之间、教师与学校管理者之间的合作和信任也是学生学习结果评价顺利开展的关键。因此,MCLP 专家组认为,教师是学生学习 and 教学质量提升的重要主体,教师应成为本科生学习结果设计及其评价的主要参与者。

(二) 学习结果设计能够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多样化需求

传统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大学传授给学生的知识与技能足够使其应对劳动力市场的需要”。但是在现实中,不少大学毕业生并不能将其所习得的知识与技能迁移应用到现实情境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不强,尚不能很好地满足雇主们的需求。

同时,受“课程多样化”(course diversification)和“分数膨胀”(grade inflation)等问题的影响,雇主们认为学生的学习成绩单已不能充分反映学生的知识与技能水平,较少把学生的学习成绩单作为衡量人才的唯一可靠参考依据。例如,在学生学分互换的过程中,学生的学分并不能在所有院校之间得到互认,只限在特定院校、特定课程之间。

基于此,MCLP 专家组指出,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学生具有不同的教育背景,所有的大学生在学分互认及就业的过程中,其学习结果设计要能够充分展现他们所具有的知识与技能。换句话说,学生学习结果评价目的应充分体现多维性,既要满足院校提升教学质量的需要,又要满足学生学分互认的需要;既要充分体现学生具备的知识与技能,又要充分反映满足雇主们对人才的规格要求。当学生真正认识到学习结果评价有助于他们继续求学或就业时,会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推动他们有针对性地提升其知识与技能水平。

(三) 学习结果评价能够综合运用多样化的测评工具

对知识与技能测评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形式的学习结果都只是从特定的方面部分反映了学生习得的知识与技能。在测评过程中,除了要关注学生习得的基础理论知识和通用能力之外,也要关注学生是否也已习得了某一专门学科领域内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同时,因学习结果类型的不同,所采用的评价形式和方法也有所不同。认知性学习结果一般采用直接性评价形式,即采用测验或考试的形式,如 ACT 开发的大学学业水平评估考试(CAAP),美国教育考试中心(ETS)组织的水平评估(Proficiency Profile)以及由美国教育援助委员会(CAE)开发的“大学校际学生学习结果评价”(CLA)等,而非问卷调查;而情感、价值观、态度等非认知性学习结果的评价,则通常采用非直接性评价形式,如“全美大学生参与度调查”

(NSSE)等,可以为高校提供学生学习经历、合作性学习、学习支持等方面的比较信息。因此,MCLP 专家组指出,学习结果的测评应该是多样评价工具的综合运用,从而才能更全面地测评学生真实掌握的知识与技能。

(四) 高等院校能够自觉自愿运用相关的学习结果测评工具

MCLP 专家组指出,在美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价活动中,单纯的外部问责在高等院校改进教学活动中的效果并不理想,并不能直接推动学生学习质量的改进。因为高等教育体系是一个复杂多样的系统,各高等院校的类型、办学使命、发展目标都各不相同,如果仅仅借助于外部问责的评估手段,那么这种质量评价在提升学生学习质量方面势必是低效乃至无效的。事物发展内因起决定作用,只有高校主动自愿地科学设计学习结果并采用适当的测评工具,才能真正推动学生学习质量的提升。

(五) 学习结果评价的数据具有高效性与可比性

围绕“如何科学测评学习结果”的问题,美国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已开始与相关教育管理部门展开了合作,许多测评联盟和协会机构也应运而生,他们彼此之间可以共享与学习结果评价有关的数据信息、有效的评估工具以及提升学生学习质量的可靠途径。因此,MCLP 专家组提出,为了提高彼此合作的信度和效度,扩大学习结果测评的影响与范围,学习结果测评的相关数据应真实有效、具有可比性,应能够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从而才能推动不同机构之间合作研发更有效的评估工具和策略,更好地满足高等教育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三、MCLP 的组织与实施

(一) MCLP 学科领域的选择

为什么要选择生物学、商学、传播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这六大学科领域?一方面这些学科领域充分体现了高等教育系统内知识类别的复杂

性和多样性，既涵盖了传统的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领域，又涉及了实践特征明显的专业学科领域。另一方面，这六大学科每年所授予的学士学位数量几乎维持在当年全美各学科所授学士学位总量的35%以上。因此，选择这六大学科领域作为样本，具有充分的代表性。

（二）MCLP 专家的遴选

MCLP 分为六个学科组进行研究。每个学科组由 10 至 15 名专家组成，这些专家由 MCLP 工作组和相关的学科协会共同遴选，其遴选的主要标准是对本科教学工作有热情，在学习结果评价方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等。这些专家大多具有相应的学科背景，熟悉并了解该学科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水平要求，因此，由他们参与设计的专门学科领域的学习结果及其评价指标，在现实中更具可操作性。在遴选专家的过程中，MCLP 要求专家的学缘结构尽可能的多元化，以覆盖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的大学。这些专家既有来自世界一流大学的知名学者，又有来自相关学科协会的学者，也有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等相关专业协会组织的政策制定者。由于大多数的学科组专家成员曾经或正在参与学习结果评价的相关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学习结果评价设计的科学性、规范性、可行性。

（三）MCLP 的政策依据

MCLP 要求这六大学科领域的学习结果评价体系设计必须以一系列相关的教育改革方案或教育政策为依据。例如，生物学科专家组在研究过程中，既严格参照了 20 多年来美国在生物学领域内提高本科教育的相关改革政策，又认真参阅了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简称 AAAS）于 2011 年出版的研究报告《生物学本科教育的未来趋势与转变：从口号到行动》（Vision and Change in Undergraduate Biology Education: A Call to

Action)。同时，这六大学科专家组也需要参照美国大学联合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简称 AACU）和全美学习结果评价研究中心（National Institute for Learning Outcomes Assessment, 简称 NILOA）在学习结果评价方面的政策建议和改革举措。例如，AACU 于 2014 年发布的《学位资格框架体系》^①（Degree Qualification Profile, 简称 DQP）报告所提出的“能力分类体系”是各学科领域界定学生必备能力的重要依据。

四、MCLP 的成果特色

（一）提出了专门学科领域内本科生的学习质量标准框架

与以往有关学习结果评价的相关研究相比，MCLP 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对专门学科领域内的学习结果进行了集中描述。六个学科专家组都将该学科领域内的学习结果描述为“核心概念”（essential concepts）与“核心能力”（essential competencies）两类，其中“核心概念”包括该学科领域的复杂概念、相关理论的理解及学科思维方式，而“核心能力”则包括参与该学科的实践活动所需要的学科专业能力和其他必要技能（详见表 1）。这些“核心概念”和“核心能力”的具体标准、评价手段以及改进策略，在各学科专家组撰写的学科白皮书中都有相应的明确陈述。

MCLP 专家组提出，各专门学科领域内有限的“核心概念”和“核心能力”框架，旨在为教师改进教学、提高学生学习质量提供有效的资源支持与指导性帮助。所以，这些“核心概念”和“核心能力”具有较强的现实可操作性，能够尽量减少教师评估学生学习质量、改进教学的工作负担，可以有效推动教师主动参与学习结果评价的实践活动。

表 1 MCLP 六大学科领域的“核心概念”与“核心能力”

生物学	进化论; 数据流; 结构与功能; 物质与能量的转化方式; 系统论	模型; 定量推理应用; 论据到论点的关联; 实验设计与科学求证的关联; 分析与评价数据; 鉴别与应用科学的跨学科属性
商学	社会与商学; 全球化; 战略; 系统动力; 消费者参与; 透明、公开与度量	多元思维技能的展开与选择; 伦理判断的运行; 信息与技术的展示能力; 管理、团队合作和跨文化能力
传播学	社会建构; 相关性; 战略; 符号主义; 适应性	交流探究能力; 适合观众、特定背景和目的的信息创造能力; 批判分析信息的能力; 自效性展示能力; 传播伦理的原则运用与实践能力; 利用传播包容不同观点的能力; 影响公众对话的能力
经济学	个人决策; 市场与其它资源的互动; 总量经济学; 政府和其他机构的角色	运用科学程序解读经济现象的能力; 运用经济学概念和模型分析与评价行为与后果的能力; 经济学中定量方法的运用能力; 经济模型及其应用的批判分析能力; 多元合作中经济学观点的交流能力
历史学	演绎叙述的历史; 过去与现在的关系; 历史证据; 复杂的因果关系; 重要性	历史叙述的评价能力; 原始资料的解释能力; 按照年代推理的应用能力; 情境化能力; 被认可的历史解释的建构能力
社会学	社会视角; 社会结构; 社会化; 社会分层; 社会变迁与社会再生产	运用社会学理论理解社会现象的能力; 客观评价、解释人类行为与社会现象关系的能力; 运用科学的原则理解社会的能力; 社会科学方法与数据质量的评价能力; 规范分析社会的科学数据的能力; 运用社会学知识影响社会争论、促进公共理解的能力

资料来源: Richard Arum, Josipa Roksa, Amanda Cook. Improving Quality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Learning Outcomes and Assessment for the 21st Century, San Francisco: Jossey — Bass, 2016: 31.

美国大学如何提升本科生的学习质量

——基于“大学学习测评项目”的经验与启示(下)

(二) 提出了专门学科专业能力的培养

(discipline — specific competencies) 与通用能力 (generic competencies) 的培养具有协同性

不少有关学习结果评价的改革举措较侧重于对本科生应具备的“通用能力”的探讨上,而 MCLP 则更聚焦于学科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和学科思维方式培养的问题上。尽管每个学科的专业知识都是独特的,但是专门学科领域内要求学生所具备的批判思维、分析写作、定量推理与问题解决能力等却是通用能力。所以,部分学者提出批判思维能力等高阶技能是通用能力,可以不分学科进行培养;也有学者指出,批判思维能力是学科专业能力,并不能自动地从一个学科领域迁移到另一个学科领域,需要在专门学科内进行培养。MCLP 专家组一致认为,培养学生的学科专业能力与可迁移的通用能力同等重要。在六个学科白皮书中,不仅一致强调了学生探究、分析和批判思维能力的培养,而且将 DQP 认定的通用能力如何在每个学科领域内进行培养,都形成了具体的细化方案。这不仅提高了通用能力培养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而且有利于任课教师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改革与研究。因此, MCLP 的特别贡献就在于,它指出了学科专业能力与通用能力之间的联系,强调了学科思维方式培养与学生的分析与整合能力及问题解决能力培养的协同性。

大学的教学是以专门学科为单位进行的,学生的批判思维、分析写作、问题解决等能力可以在专门学科领域内进行培养。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习得了学科专业技能,而且可以为学生在不同学科领域内进行技能迁移奠定基础。如果在某一学科领域习得的通用能力不能很好地迁移到其他学科领域,要么是对高阶技能的评价指标缺乏科学设计,要么是对能力可迁移性的评价指标缺乏科学设计。所以, MCLP 专家组指出,在专门学科领域研发能够科学测量复杂性思维技能的评价工具非常关键,

运用得当的测评工具，教师可以综合评估技能迁移的有效性，能够持续有效地改进教学、提升学习质量。

（三）指出专业基础课程（introductory courses）与专业主干课程（major courses）的学习结果存在差异性

专业基础课是学生掌握专业知识技能必修的重要课程。不同的专业有各自的一门或多门专业基础课，同一门课程也可能成为多门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专业主干课程是专业必修课程，是本专业所有学生必须选修的课程。在传统观念上，人们普遍认为，两者在学习结果界定上差异性并不大。但是MCLP研究发现，对不少学科而言，界定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结果存在挑战，因为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内，专业基础课程的特点各不相同。例如，在历史学中，学生要选择学习的专业基础课程具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在传播学中，基础课程《公众话语》（PublicSpeaking）并没有集中体现传播学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要求；在社会学中，专业基础课程并不是必需的；而在经济学和生物学中，专业基础课程之间则具有一定的序列关系，一些课程是学习另一些课程的基础和前提，学生只有掌握了一些课程必需的知识与技能，才能顺利完成另一些课程的学习要求。

MCLP 专家组认为，这一问题的存在既反映了不同学科结构的差异性，又体现出高等教育系统内有些学科课程设计“缺乏意向性”（a lack of intentionality）的特点。当课程设计“缺乏意向性”时，教师很难持续渐进、系统有效地教授学生学科专业知识、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尤其是在知识高度分化的学科领域内，教师无法精准判定学生在选修课程时具备了什么样的知识和技能，很难精准地设计专业主干课程的学习结果。

尽管学科课程“缺乏意向性”的问题已经受到了各界的持续关注，但是高校内部并没有太多的院系有决心、有信心把现有相对分散的学科课程体系整合成一个具有紧密内在逻辑关联度的课程体系。虽然相关的认证机构已经要求参与认证的院校要明确界定各自的学习结果，但是在具体实践中，这种要求很难切实转化成一种有效而持续的课程评价行动，并不能真正实现课程目标与学习结果相一致的理想。一般情况下，对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储备不做要求的专业课程，或是学生选修的第一门专业课程，更有可能让学生掌握宽厚的知识体系，更有助于学生通用能力的培养。所以，在院系层面上，如果能够明晰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主干课程的学习结果，不仅有利于教师优化、整合课程体系，而且会为学生高效学习专业课程提供一个综合移动的“脚手架”。

（四）指出开发专门学科的标准化测评工具是未来学习质量评估的重要发展趋势

针对现行评价工具不能精准测评学生深度理解能力的问题，MCLP 专家组指出，随着评估技术的不断发展，研发标准化的测评工具来测评学生的复杂性理解能力与 21 世纪所必需的通用技能，将成为可能。尽管现存的标准化测评工具大多发起于 20 多年前，但是不少院系仍要借助于这些评估手段来收集与学生学习相关的数据，从而推动院校自我改进、自我提高。因为标准化测评工具的优势相对明显，一方面，它采集的样本信息量大，能够相对更准确地评估学生所习得的知识 and 能力；另一方面，它耗时少、易评分、可比性大，便于不同类型的院校之间进行对比分析。同时，它的使用范围广泛，可以跨越单一课程的局限，教师只要根据实际需要设计更高质量的问题、引入最新的评估技术，它就可以得到优化，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在评估中发挥作用。例如，在经济学评价中使用的开放性

仿真数据分析方法，通过让学生分析、解释真实的经济数据，可以测评学生运用经济学知识解决复杂任务的应用能力，考察学生能否将习得的分析和评价信息的能力迁移到新的情境中。

同时，MCLP 专家组指出，现有的质量评估活动中缺乏适用于专门学科的测评工具。一方面，目前针对学生学习结果的测评工具主要适用于美国高等教育质量认证的需要，专门学科领域内可以有效运用的标准化评估工具较少。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在一些学科领域内，学生复杂性思维（complex thinking）、高阶技能（higher order skills）或是思维习惯（habits of mind）等方面的适用性测评工具并不多见。不同的学科对学生在该学科领域内所应习得的“核心概念”和“核心能力”要求不同，如果教师运用了忽略学科特质的测评工具，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该学科领域内学生学习结果评价的有效性。或者说，这种测评结果并不能真实反映学生是否具备了应习得的知识与技能。所以，虽然不少大学积极参与了学生学习结果评估的相关项目，但是他们依然面临着专门学科适用性测评工具缺乏的窘境。例如，美国普渡大学在2013年就计划要出台一个关于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批判思维和其他技能如何形成的评估计划，但至今尚未形成具有共识的评估计划。再如，美国曾有8所大学参与了比尔·盖茨基金赞助的大学生学习结果评价项目，该项目致力于研发一个具有普遍推广价值的全面评估框架，但由于缺乏对专门学科领域的学习结果进行有效测评的工具，其研究结果并不理想。所以，MCLP 专家组指出，研发基于专门学科的标准化测评工具以真实评价学生的学习质量，是未来大学生学习质量测评的重要方向。

五、MCLP 的经验与启示

（一）形成专门学科的学习结果评价体系是本科生学习质量有效提升的重要抓手

一直以来，关于本科生“应该学会什么”的探讨持续不断，争议不止。本科生学习是以学科专业为单位进行，各学科专业展示了相应领域内本科生所应获取的重要复杂性知识和核心技能。因此，针对专门学科的学习内容展开评估，对于真实了解学生知道什么以及能够做什么非常关键。MCLP 在六大学科领域内形成的本科生学习结果评价框架，为该学科领域内本科生“应该学到什么”提供了“路标”。这不仅体现了学科专家们对专门学科学习质量标准的初步共识，为开展有效的本科教学质量评价提供了“脚手架”；而且明确了各学科的专业人才培养标准，为任课教师主动自愿、积极有效地改进教学实践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结合我国大多数高校人才培养标准不尽合理、空泛现象突出而导致的本科生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的问题，科学设计专门学科的学习结果及其评价指标，对于充分调动教师主动参与教学研究、改进课堂教学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可以组织高等教育专家和学者逐步探索细化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学科本科人才应具备的知识、能力、素质等多维学习结果，设计开发能够测试各种学习结果的标准化考试或问卷，形成既有国际视野又适用中国高校实际需求的测评工具，适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为高校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提供针对性指导建议。

另一方面，各高校以二级学院为单位，组织专任教师围绕该学科的“核心概念”和“核心能力”展开研讨，明确各学科的本科生学习结果，敦促教师从专业层面和课程层面上细化相应的学习结果，如学生应达到什么样的能力、习得什么样的概念知识、具备什么样的综合素质等；让教师真正明白“需要教什么”、“怎么教”，学生真正理解“需

要学什么”、“如何学”；以学生学习结果为出发点，“倒逼”教师细化各专业人才培养标准，从而形成可操作性强、切实有效的人才培养方案，使人才培养标准层层分解到专业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和课程教学要求中，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教学环节上，有力保障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二）开展学习结果评价的专门培训是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重要突破口

“理解并规划好学习结果是教师有效进行课程设计的核心，只有真实了解学习结果的内涵，才能够创造必要条件评估教学的有效性，从而推动教师切实地改进教学活动。”而要真正理解学习结果的内涵、规划好学习结果，需要教师认真思考“要教给学生什么样的知识和技能”、“要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课堂学习兴趣”、“要如何帮助学生习得这些知识和技能”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测评教师教学能力优劣的重要内容。MCLP 提出的专门学科学习结果评价框架，可以帮助任课教师深入理解、修订教学目标，全面审视课堂教学与本科生学习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当任课教师能够科学制定一门课程的具体学习结果时，他们将会选择适当的教学策略来反思、改进教学，选择适当的评价手段综合测评学生的学习效果，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升学生的学习质量。

立足当下“高校如何提升教师教学能力”的现实需要，高校不妨把对学生学习结果评价方面的培训纳入教师专业化发展体系中，由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与相关职能机构协作，围绕“如何科学设计一门课程的学习结果及其评价指标”展开专题培训，帮助教师将各学科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转换成具体的学习结果，帮助教师开发和使用有效的测评工具等。通过专题培训，学校可以为教师提供各种最直接的指导和支持，解决他们在评价过程中所遇到的技术、资源、方法等方面的困难，帮助教师顺

利完成评价目标。同时，高校也可以采取适度的奖励机制激发教师参与学生学习结果评价的内在动力，如可以将教师开发和使用新型质量测评工具所需的时间和精力计入工作绩效考核中，与教师的经济收入直接挂钩；由学校出台相关政策文件，支持、奖励运用学习结果评价进行有效教学的课程，引导他们不断反思课堂教学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从根本上激发教师积极投身教学的热情和动力，促使他们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

（三）综合运用多样化的测评工具是未来本科生学习质量评估的重要趋向

MCLP 专家组指出，21 世纪的质量评估工具不能只是简单地确认学生对课程材料的“二次搜集”（the second collection of the course content）程度，相反，他们需要确认更复杂的技能和学科思维，而这就需要研发更复杂、更富创新性的评估内容和评估手段。因此，多样化测评工具的研发及其应用对未来本科生学习质量的测评具有重要意义。

“仅靠每天称重并不能让猪胖起来，只靠点击秒表并不能提高赛马的速度，只是不停地观测温度计并不能让发烧的狗退热。事实上，学生学习质量的提升并不是评估的必然结果。”因此，评估只是手段，能否达到提升学习质量的目的，关键是评估要与改进切实地统一起来。CLA、ETS、AACU 等机构所研发的测评工具从不同的方面为我们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质量提供了相关数据，开阔了我们的分析视野。随着现代评价技术手段的不断更新，相关的测评机构将会持续研发各种各样的测评工具。无论是传统的学业论文、考试、演讲、学情调查、学生成绩单和教师评语等测评方式，或是其他更新、更好的测评工具，都是帮助教师充分了解学生学习状态的信息渠道。

然而，如果院校和教师仅仅是运用这些信息义务性地撰写年度质量评价报告，而不是用于测评专

业及其课程教学的效果，那么再好的测评工具都无法发挥真正的改进作用，也难以达到提升学生学习质量的目的。所以，若要真正发挥“以评促改”的积极作用，需要高校和教师认真思考如何有效运用多样的测评工具，才能将测评结果真正地教学质量改进、学习质量提升结合在一起。

（四）重视教师的主动参与性是持续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

MCLP 研究表明，高等教育若要真正实现促进学生发展的根本目标，除非教师在专业及其课程设计方面具有公共责任意识。这种公共责任意识不仅会敦促教师在专业及其课程设计中不断与各利益相关者进行价值协商，科学设计学生学科专业知识和通用能力建构的长效机制，而且会转化成教师内在的精神价值追求，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教师主动从事教学、自愿改进教学质量、提升专业发展的动力。

目前，我国各类高校都把落实本科教学中心地位摆在了学校各项工作的前面，都在为如何提升本科教学质量费尽心思。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本科阶段有效教学与有效学习的结果并不理想，教师主动愿意投身教学工作的动力严重不足。因为不少院校只是把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看成行政工作来执行，所采取的相关措施具有明显的行政色彩。这种自上而下的评估方式，没有充分关注教育教学的规律性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教师的主动参与性。无论是水平评估或是审核评估，本科教学评估都是一场有关教师专业发展的持续对话，是一个如何推动课程改革、提升学生学习质量的永久性课题。只有当教师愿意、主动参与这场对话时，这种活动才真正具有意义。提高教学质量是教师们集体行动的结果，仅靠个别教师的努力远远不够。在质量评价过程中，如何充分调动教师在学生学习结果设计及其测评工具研发与应用方面的参与积极性，实现“以

评促建”，推动本科教学质量的持续提升，任重而道远。

作者：贾莉莉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来源：《高教探索》2017年07期



2005年—2015年全国与湖南省普通高校在校外国留学生人数

单位：（人）

